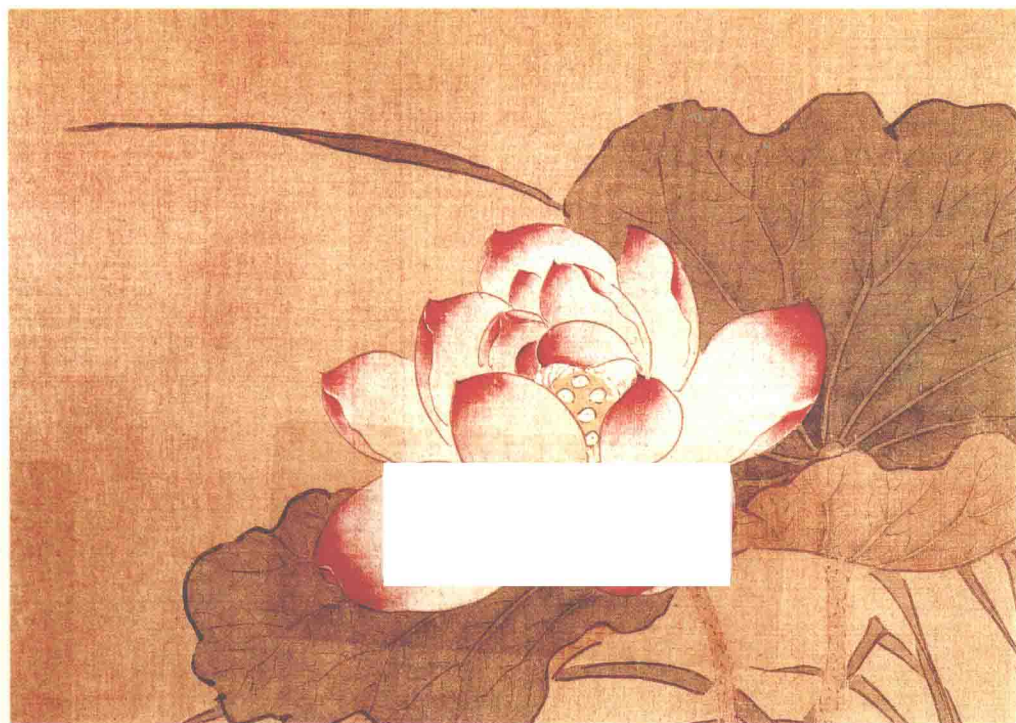


华夏文库  
佛教书系

# 三教归一 佛教与道教、儒教

刘聪 王黎芳 著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都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儒教和道教的真正形成是在汉朝，儒教在汉武帝时期获得了独尊的地位，道教是在东汉动荡的社会中产生的，而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则是在两汉之际通过西域传入了中国。佛教在传入中国的最初一段时间中，主动借用中国传统儒教和道教的思想资料，将来自异域的佛教装扮成中国的样式，以便于中国人接受。

上架建议：文化 宗教 社科

ISBN 978-7-5348-4706-6



9 787534 847066 >

定价：20.00元

华夏文库·佛教书系

# 三教归一

## 佛教与道教、儒教

刘聪 王黎芳 著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教归一：佛教与道教、儒教 / 刘聪，王黎芳著.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5  
（华夏文库）  
ISBN 978-7-5348-4706-6

I. ①三… II. ①刘…②王… III. ①佛教－研究－中国  
②道教－研究－中国 ③儒家－研究－中国 IV. ①B949.2  
②B959.2 ③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3097号

华夏文库

三教归一

总策划 耿希新  
责任编辑 李颜奎  
封面设计 新海岸设计中心  
版式设计 曾晶晶  
美术编辑 曾晶晶  
责任印制 刘新毅  
项目统筹 单占生 萧红（执行）



出版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编：450002  
电话：0371-6578869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960毫米×640毫米 1/16  
印张 8印张  
字数 60千字  
印数 1-3000册  
定价 2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华夏文库》发凡

毫无疑问，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精神追求、文化叩问与出版理想。我们不禁要问，在 21 世纪初叶，在全球文明交融的今天，在信息文明的发轫初期，作为一个中国出版人，我们正在或者将要追求什么？我们能够成就或奉献什么？我们以何种方式参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进程？在一连串的追问下，于是，有了这套《华夏文库》的出版。

自信才能交融。世界各大文明在坚守自身文化个性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探视其他文化精神内涵的步伐，世界不同文明正在朝着了解、交流、碰撞、借鉴与融合的方向前进。在此背景下，建立自身的文化自信，正是与世界各文明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基本要求。五千年中华文明与文化正在不断地被其他文明所发现、所挖掘、所认知，汉语言正在生长为世界语言，儒文化正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

借助这样一种正在成长着的文化自信、自觉、开放、亲和之力，用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眼光全面系统梳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与文化，向其他各大文明与文化圈正面展示自我，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我们出版这套文库的目的之一。此其一。

知己才能知彼。身处五千年文化浸润的今天，重新思考我们先人的人生思考、价值思考与哲学思考，找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

所在、立命所在、安身所在，这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人与出版人不得不再思考的问题。作为中华文明的一分子，我们在思考的同时，还必须了解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如何优秀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以及社会文明。只有熟知自己的文化，热爱自己的文化，悟明自己的文化，我们才能宣说自己、弘扬自己、光大自己。因此，我们策划组织这套《华夏文库》的初衷，还在于让当下的知识青年全面系统瞭望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全景，并借此能够对更为深广的世界各民族文化提供一个比较认知的基础。此其二。

顺势才能有为。我们正处在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交汇处，信息文明带领我们从读纸时代进入读屏时代，以智能手机屏幕为代表的书籍呈现方式正在与纸质书籍争夺阅读时间与空间。我们正在领悟数字技术，正在以信息文明的视角，去整理、分析和研究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为了唤醒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还在生发和原创着当今时代的文化。由此，我们试图架起一座桥梁——由纸质呈现而数字呈现，由数字呈现而纸质呈现，以多媒介的书籍呈现方式，将文字、图像、声音与视频四者结合，共同筑成《华夏文库》以奉献给信息文明时代的新读者。此其三。

总之，这是一套——专家大家名家写小书；以最小的阅读单元，原创撰写中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与社会文明系列主题与专题；以图文、音视频多媒介呈现的方式，全面介绍与传播中华文明与优秀文化，系统普及与推介中华文明与文化知识；主旨是为了让世界与中国共同了解中国的——大型丛书，借此，复兴文化，唤起精神，融入世界。

耿相新

2013年6月27日

# 目 录

## 一 相遇与借用

——汉朝的佛教与儒道

- 1 汉朝的宗教 ..... 2
- 2 初传时期佛教对儒道的借用 ..... 21

## 二 冲突与融合

——魏晋至唐的佛教与儒道

- 1 佛教与儒道的冲突 ..... 33
- 2 魏晋至唐佛教与儒道的融合 ..... 47

### 三 合流与辅政

——宋至清的佛教与儒道

1 三教合流·····	70
2 三教辅政·····	91

## 小知识目录

“儒教问题”争论 .....	18
佛教传入中国的诸种说法 .....	19
汉魏南北朝时期佛教理论中国化的三种途径 .....	30
梁武帝与汉传佛教徒的“断肉食”戒律 .....	68

# 一 相遇与借用

## ——汉朝的佛教与儒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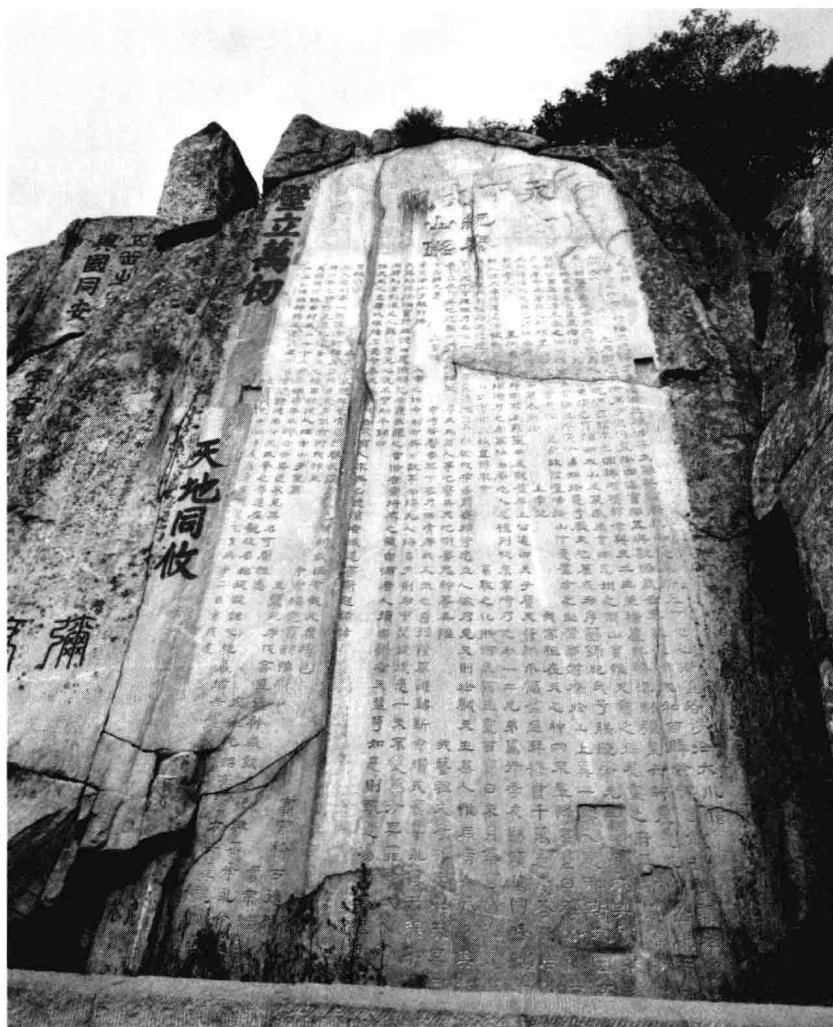
儒、释、道三教如同鼎之三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事实上，在汉朝以前，并没有佛教、儒教和道教之称，它们是在汉代以后才逐渐形成或传入中国，并在相互交流和碰撞中促进了各自的发展。

## 1. 汉朝的宗教

中国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都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儒教和道教的真正形成却是在汉朝，儒教在汉武帝时期获得了独尊的地位，道教是在东汉动荡的社会中产生的，而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则是在两汉之际通过西域传入了中国。

### 儒教的形成

汉朝建立之初，由于经济崩溃、民生凋敝、诸侯王叛乱等问题的影响，中央政权的稳定乃至生存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因此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思想学术形势来看，几乎不可能构建起以儒学为核心的统治思想体系。汉朝初年，为顺应特殊形势的需要而实行了特殊的国家治理方式，即“休养生息”，在这种情况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成为了当时政治的指导思想。经过 60 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社会经济得到恢复，重建统治思想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学术思想等条件基本成熟。于是汉武帝开始着手统一思想，建构适应中央集权



# 《记泰山铭》

唐玄宗李隆基东封泰山所书，刻于唐开元十四年（726年）九月



政权需要的统治思想体系。他宣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将兼收其他学派的思想而发展起来的汉朝儒学作为新的统治思想。儒学从此获得独尊地位，在这一背景下，儒学开始了新的发展形态：由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逐渐演变为具有神学色彩的汉朝儒教。儒学在汉代的发展变化可以简单归纳为如下几点：

首先，汉儒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丰富了儒学的内容。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使儒学初步具有了宗教性质。“天人感应”是指上天和人类能够相通，上天能干预人间的事情，人的行为也能被天感受到。这种观念的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我国远古时代的宗教观念。远古时代的人们认为，天和人之间可以相互感应，如果人间的事情做得好，会得到上天的奖赏，做的不好，会被上天处罚，对于部落首领来说也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董仲舒在继承前人宗教思想的基础上，将其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并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儒教的“天人感应”论。在论证帝王权力的来源时，董仲舒说：帝王是人世间至高至尊，其权力是“天”授予的，其至高地位也是“天”确立的。因此，对“天”而言，帝王是“天之子”，所以帝王要通过“祭天”来感谢上天的恩德。在他看来，祭天是帝王最重要的事情，甚至超过祭祀诸神和生身父母，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废弃，即使在灾荒之年、征伐之时、大丧之际，都不可停止。帝王祭天也不可让他人代替，场面越宏大、越隆重越好，否则上天就会降下灾异，甚至会使国家败亡。

董仲舒还认为，人是天创造的，人的形体构造和精神性情等都像天，是天的副本。天有 366 日，人就有 366 个小的关节；一年之中有 12 个月份，人就有 12 个大的关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有阴晴冷暖，人有喜怒哀乐；天有四季更替，人有生老

白虎通德論卷第一

臣班

固

纂集

爵

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昔何王者父  
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得地載  
謂之天子上法斗極命決曰天子爵稱也  
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  
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  
作民父母以養天下

班固《白虎通德论》

建初四年（79年），东汉汉章帝为统一对谶纬的解释，召开白虎观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一书。该书是汉代谶纬的汇编

病死。总之，人是天的复制品，天人的结构是一致的。再如，董仲舒主张天可以通过祥瑞或灾异对人进行奖赏或惩罚。按照天道行事，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符合天的意志，天就会降下凤凰、麒麟、嘉禾等祥瑞，表示对帝王的赞许奖赏。否则，天就会降下日食、陨星、地震、水患等灾害，以示其对帝王的不满和惩罚。儒家通过这样的一套理论，既维护了统治者的皇权天授的至高地位，也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政，依照天道而行。

其次，儒学发展的谶纬化。谶纬思潮是西汉中后期与儒学密切相关的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思潮使儒学具有了一种神秘主义色彩。谶的本义是应验、灵验，“一语成谶”这一成语，表示的就是预言能在未

来成为现实之意。凡是预言吉凶而有应验的隐语，都可叫做谶。谶语的作者大多假托天帝或神仙，用简括谐隐之语，以预示某种尚未成为现实的所谓“天机”。例如，秦朝时，有谶语“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北方的胡人会灭亡秦朝，就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并修筑长城，秦朝灭亡之后，才有人分析说灭亡秦朝的“胡”指的不是胡人，而是他的儿子胡亥。

而纬是假托孔子之名对儒家经书所作的神学解释。有纬书称，孔子在出生之时，就有一系列神异的事迹。他的母亲在尼山的山坡睡觉，梦见与黑龙交媾，而生孔子。孔子出生后，有特殊的形象：嘴唇有斗厚，舌头有七重长，所以他以后能口若悬河，成为万世师表。这些富有神学意味的谶纬，在汉代十分流行。汉平帝时，有人上奏说，武功县人在掏井时掘得一块白石，其上有字“莽为皇帝”，有人就说这是上天告诉世人王莽可以做皇帝。三年后，在长安读书的广汉郡人哀章揣摩透王莽的心思，遂造谶语迎合以谋取富贵。他预先造两个铜牌，一个上面写“天帝行玺金匱图”，另一个上面写“赤帝行玺帮传予黄帝金策书”，“书”中说王莽是真龙天子，并将自己列为辅佐王莽的八大臣之一。于是，王莽以谶语为根据，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新”，哀章也因此被封为“美新公”。

东汉光武帝起义时也利用了谶纬。南阳人李通散布“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谶语，敦促刘秀起事。经过数年征战，刘秀的势力大增，又有人造出新的谶语：“刘秀起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起兵于南阳，根据五行之说，南方主火，这里的火是指刘秀。四七是指汉朝建立之后的第二百八十年。这句谶语的本意是：刘秀将于汉朝建立之后的第二百八十年之际成为天下之“主”。谶纬思想的流行成为两汉儒学的一个特点。

再次，儒家的祭祀活动的兴盛。据说，汉元帝曾经得病很久不见好转，而梦见祖宗责备他停止了祭祖活动。于是大臣匡衡虔诚地向高祖庙、文帝庙、武帝庙写了一篇祈祷文，向祖宗陈述了元帝停止祭祖的原因，请求祖宗的原谅，不要降罪于皇帝。匡衡在祈祷文中说：过去常常祭祖，是为了稳定人心；现在国家稳定了，很多祭祀可以停止了。倘若这样做违背礼制，伤祖宗之心，请降祸给臣子，让臣子得病，而不要让皇帝受灾。元帝这次停止祭祀，原本是为了顺应天命民心，但当今皇帝不仅没有因此获福，反而得病。皇帝想恢复旧制，是臣下说那样做不可。假如伤了诸位祖宗的心，罪在我们这些臣子，旧制不能再沿袭下去了，希望祖宗明察。

由于儒家地位的上升，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汉代也得到了祭祀。汉成帝时，大臣梅福建议，鉴于孔子的功劳，应册封孔子的子孙。如果成帝这么做了，无子的成帝必然会得到上天赐予的继承人。汉成帝接受了梅福的建议，册封孔子的后裔孔吉为公侯。汉平帝时，孔子和周公一起，被列入国家的正式祀典。

总之，到汉朝时，儒学不再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它在政治上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在内容上弥漫着宗教神学的色彩，在形式上成为祭祀崇拜的一部分。可以说，此时的儒学已经由先前的学术思想演化为一种宗教——儒教。

## 佛教的传入

### 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第一，印度佛教向外传播。自公元前 6、7 世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后，佛教在印度次大陆的影响日益扩大，至公元前 3 世纪的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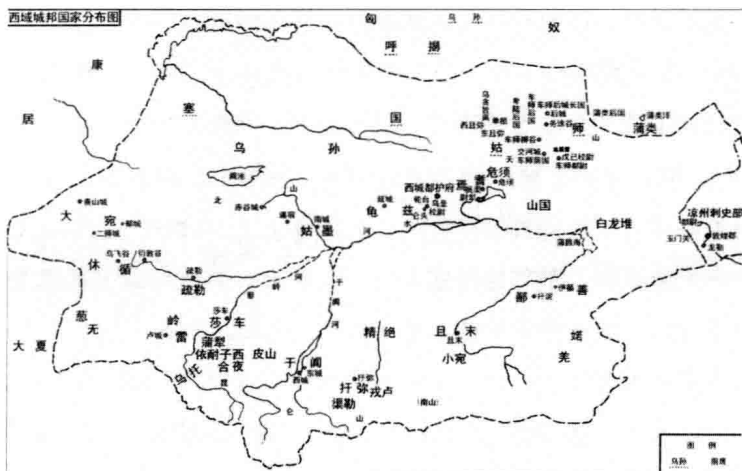
释迦牟尼佛镀金坐像

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诞生于蓝毗尼园一棵娑罗双树下。现藏于尼泊尔博卡拉蓝毗尼

度孔雀王朝时，佛教传播的区域逐渐扩展到印度以外的地区。公元前324年，旃陀罗笈多（月护王）在印度旁遮普地区建立了孔雀王朝，逐渐开始了统一全印度的事业。到他的孙子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时，建立了统一全印度的国家。阿育王是佛教史上有名的保护佛教的国王，被佛教徒尊称为“法阿育王”。他不但每年向佛教僧侣施舍大量钱财，举办规模盛大的佛教集会，而且利用国家权力在各处建立寺塔，派遣僧侣传教，扩大佛教的影响。在公元前3世纪时，佛教不但扩展至印度各地，而且向东传播至孟加拉、缅甸等地，向西扩大中亚地区。据《那先比丘经》记载，当时巴基斯坦北部“舍竭国”的国王弥兰托原本喜欢“异道”，不信佛教。来此传播佛教的那先和尚与弥兰托国王讨论佛法问题，就人的精神和身体、善恶报应、生死轮回、佛教修行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最后，国王皈依了佛教，出巨资供养那先和尚，并提供800名僧人的衣食之需，供其建立佛教僧团。

两汉时期，佛教传入西域地区（现今新疆境内），西域的许多民众都信奉了佛教。梁朝僧祐撰写的《出三藏记集》中记载了东汉桓帝时西域安息国太子安世高信奉佛教的故事。安息国是西汉时期在西域地区的一个国家，领土一度深入至印度西北部，印度佛教在其境内有很大的影响。安世高原本是安息国的太子，自幼喜爱佛教，常与僧人一道讲经说法。老国王去世后，安世高深感世事无常，荣华富贵皆是过眼云烟，于是在服丧期结束后，将王位让与叔叔，自己出家为僧。出家以后，安世高博览群经，尤其擅长佛教毗昙学，成为西域地区的佛学大师。由于佛教向印度之外地区，尤其是在中亚地区的传播，佛教有了传入中国的可能。

第二，汉代内地与西域之间的频繁交往。自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后，西域各国与内地的交流一直十分频繁。西汉宣帝派卫司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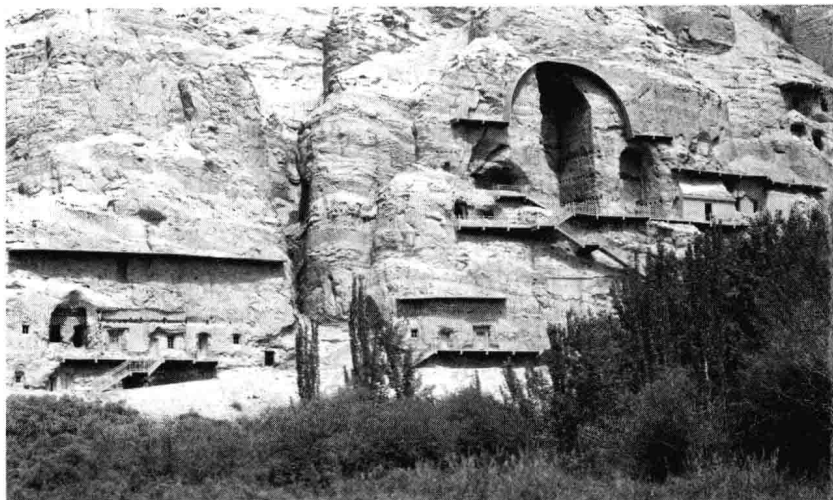


汉代西域地图

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等地区

统辖天山南麓、鄯善以西的诸国，但对天山北麓的西域诸国还没有建立巩固的统治。此后不久，统治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叛离匈奴投降西汉，宣帝借此契机正式控制了整个西域，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于龟兹东北的乌垒城，管理整个西域事务。汉元帝又派军队屯田于车师前王庭，协助西域都护镇守西域。此后，西域各国与汉朝的政治经济往来日益密切。例如，汉武帝曾将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作为公主嫁给西域乌孙国王为妻，与乌孙结为亲戚关系。宣帝时，乌孙的邻国娶细君公主之女为妻，借此与汉朝攀上了亲戚。宣帝末年，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携乌孙国多人回长安养老。

东汉以后，西域各国与汉地的往来依旧十分频繁。东汉光武帝时，



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

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建于 3 ~ 4 世纪，盛期为 6 ~ 7 世纪，是中国最早开掘的一处千佛洞

西域鄯善等十六国联合派遣王子入朝进贡，并要求东汉按照西汉的做法，派遣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事务。光武帝因国内初定，顾不上外事，表示暂不派驻西域都护，但对他们厚加赏赐，并承诺以后会加以派遣。两汉时期，在汉地与西域各国之间的密切往来中，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传到了中国内地。

第三，两汉社会的宗教需要。两汉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信仰较为兴盛的时期。两汉的历代皇帝们经常举行各种宗教祭祀活动。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 113 年），汾河之阴挖掘出一个古鼎。地方官奏称是黄帝的宝鼎，它的出土是当今皇帝受天命护佑的祥瑞。方士公孙卿趁机伪造“鼎书”上奏武帝：黄帝得到这一宝鼎时，巫师鬼臾区告诉黄帝，



如果能在以后的每年冬至日设坛祭祀这个宝鼎，那么就能够得到上天的庇护。此后的380年中，黄帝每到冬至日就按照鬼臾区的说法设坛祭祀宝鼎，黄帝最终登天成仙。公孙卿还说：如果武帝也按照黄帝那样祭祀宝鼎，就会与黄帝一样登天成仙。武帝为此非常高兴，命官员在甘泉宫设置一个祭坛，坛分三层，坛下设八条“鬼道”。武帝身着紫色绣衣，其他参加人员身着各色衣服，轰轰烈烈地祭祀宝鼎。第二年又如法炮制地祭祀一番。在两汉时期，类似于这种轰轰烈烈的祭祀活动还很多，社会上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各种形式的宗教活动非常盛行。当时社会上的这种宗教气氛，使中国人有了接受佛教的外在环境。

### 汉明帝时佛教的传入

在佛教界，一般把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据这两本书记载：汉明帝曾在夜间梦见浑身闪烁着光芒的神人飞到殿前，梦醒后身心十分愉悦。明帝问群臣梦见的神人是谁。善于解梦的傅毅说：“臣闻西方有神，其名曰佛。佛有佛经，就有佛教。过去武帝时，霍去病出讨西域，休屠王曾进贡金佛像一尊，置于甘泉宫中。想来陛下所梦，莫非是佛的幻影。”于是汉明帝派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到西域大月氏国抄来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在都城洛阳城西雍门外建起佛寺，寺中画满了精美的壁画，描绘当时人们迎请佛经的情景；在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制作佛像。明帝在为自己修建的陵墓中，也画上了有佛像的壁画。此后的各种史书都沿用了这一记载，将汉明帝遣使西域求法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例如，袁宏《后汉纪》及范曄《后汉书》等



### 《佛说四十二章经》石碑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内。据历史记载,《佛说四十二章经》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第一部重要经典著作。经中把佛说的某一段话称为一章,共选集了四十二段话,故称《佛说四十二章经》

正史,《老子化胡经》、《历代三宝记》、《佛祖统纪》、《汉法本内传》、《帝王年谱》等宗教经典,都有类似的说法。南梁慧皎的《高僧传》,描述得更加详细:汉明帝于永平年间遣蔡愔等往“天竺”求法,并请得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僧人来到洛阳,译《四十二章经》,建洛阳白马寺。白马寺成为汉传佛教的祖庭,至今还是国内很有影响的寺院,可见,汉明帝派人西求佛法的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其中的细节就难免有后人杜撰的成分了。

汉明帝以后,佛教在汉地流传的记载越来越多。起初是将佛教与道教一起建祠,并行尊奉。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并说“饰

华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其目的，一是“求福祥”、“致太平”；二是“凌云”而成仙。这里的浮屠指的就是佛教。

东汉桓帝和灵帝时，西域僧人安世高在洛阳翻译出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以及其他佛教论著。在洛阳翻译佛经的还有另外一位安息人安玄。据说他是一位在家持戒的居士，汉灵帝末年到洛阳经商，因有功于朝廷，被封为“骑都尉”，精通汉语，常与僧人讲论佛法。安玄与汉族佛教信徒严佛调合作，翻译出《法镜经》一卷，内容是劝人信奉佛教，并说在家居士应遵守佛教戒律。

汉朝末年，由于笮融信仰佛教，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广陵（今江苏扬州）、下邳（今江苏宿迁）、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大建佛寺。据说他建造的佛寺十分宏伟，以铜作佛像，用黄金涂身，穿彩锦之衣，佛殿规模之大，可容纳千人以上。不仅如此，笮融还用信佛就免除徭役的方法招引百姓归信，使数万人成为佛教信徒。由此可见，到汉朝末年时，佛教发展所需要的经典、寺庙、信徒都已经具备，这为后世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 道教的产生

我们知道，道教尊老子为教主，而老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然而，道家和道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道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而道教是东汉时期产生的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

### 道教产生的背景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产生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

第一，道教产生的历史背景。马克思说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孕育道教产生的东

汉社会现实，正是马克思这一观点的最好例证。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农民丧失土地后，一部分沦为依附豪强地主的佃农或雇佣，受着极其残酷的剥削，而更多的农民则变成无家可归、辗转漂泊的流民，处境十分悲惨。东汉灵帝虽然号称天下之主，富有四海，但在他看来，这些都太虚了，只有把钱攥在自己手里才最稳当。于是外邦、各郡、各封国每次进贡，未纳入国库前，他就先行抽成据为私有，还美其名曰“导行费”。这种行径，就连他身边的宦官吕强都看不过去，写奏章说：近年来谷价便宜，家家户户却挨饿没饭吃。连年灾荒，按市场规矩，谷价应该上涨，但是谷价反而更向下跌，这是因为朝廷和地方官赋税繁重，刑罚急暴，农民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缴出最后的一粒谷来买眼前的性命。在这种社会现实下，广大农民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拿起武器，像黄巾起义那样反抗东汉政府的残暴统治；二是诉诸于宗教信仰，幻想有一种超人间的力量来伸张正义，帮助他们改善处境，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护佑上，在这种社会大势之下，道教得以产生。

第二，道教产生的信仰基础。秦汉以来，神仙信仰在民间十分流行，这为道教的产生奠定了信仰的基础。秦始皇为求长生不死之方，听从方士卢生的建议兴建咸阳宫，想求得神仙真人降临。又选派徐福携 500 童男 500 童女入海以求丹药，后受方士的蒙蔽，终至身死沙丘，一无所获。汉武帝晚年，酷爱神仙方士之术，并不亚于秦始皇。武帝遣使入渤海寻找蓬莱仙岛和仙人安期生，结果一无所获。武帝因酷好神仙方士之术，曾立五祠，建甘泉宫，筑承露盘，修造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等海中神仙居住的建筑。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后，也重鬼神之事。他在洛阳城南 7 里处建立神坛，中间为主坛，上设天地之位，周围设 5 个副坛，分别设青、赤、黄、白、黑五帝之位，最外层按照星辰的位置设立神道；在洛阳城北 4 里处，另外建立祭祀五岳的神坛。



### 蓬莱阁

神话中渤海有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秦汉时期的方士声称居住在其上的仙人有长生不死的仙丹

洛阳南北郊的两处神坛，供奉了多达 1514 位各路神仙。秦汉时期的神仙信仰，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宗教迷信思想的反映。这种普遍存在的宗教迷信思想，为道教的产生准备了适宜的土壤。

## 道教的产生

到汉末桓帝、灵帝时代，道教在汉朝的不同地域开始出现，其中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是最早产生的道教派别。五斗米道的创始人是张陵。东汉顺帝时，张陵进入四川，在今成都市大邑县境内的鹤鸣山学道，并创作道书或称符书以教百姓。张陵最初借为人治病的名义传教，后来入道者需交纳米五斗，故俗称“五斗米道”。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教，张衡死后，其孙张鲁继之。祖孙三代，世人称为“三张”。



苏州桃花坞木版古年画：《天师镇宅》

中国民间认为张贴“天师镇宅”年画可以保护居宅平安，祈福消灾。张陵在东汉顺帝年间，创立了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是道教早期派别之一，因入道者需每人缴纳五斗米而得名

到了张鲁传教的时期，已经据有东川，掌握实际的地方行政权，设置官吏，皆以鬼神之道命名，俨然如同一路诸侯，执掌政教合一的实权，对于四川政局，有举足轻重之势，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施行宗教统治的第一人。

汉代道教的另一重要派系太平道的创始人是东汉末年组织黄巾军起义的张角。张角最初以跪拜向神忏悔的方式布道，又用“符水咒语”为下层民众治病，备受欢迎。10余年间，教徒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达百万之众。后来他预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太平”，预谋在邳城发动起义。由于叛徒唐周告密，京城洛阳 1000 多太平道信徒被杀，原定于甲子年（184 年）三月五日



### 祥瑞、升仙图

南阳市王室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右边一方士，手持一牛角作狂奔跃，其后有一羽人持仙草与一龙相戏；左边有一龟蛇交体的玄武和一身似马，头生一角的神兽

的起义被迫提前到二月。在黄巾起义中，大批太平道骨干在战斗中牺牲，太平道组织解体，剩余的信徒大都融入五斗米道中。太平道虽在黄巾起义后瓦解，但对后世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

### 小知识◎“儒教问题”争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之“教”，原意是教化之“教”，并非宗教之“教”。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没有宗教这一用语。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后，西方宗教概念传入了中国，随之而来的是“儒教非宗教说”和“儒教是宗教说”之间的争论。1978年，任继愈先生再次提出“儒教是宗教”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学术界越来越关注

这个问题，探讨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刻。2001年以后，“儒教问题”争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热度，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要问题。

学术界关于“儒教问题”的争论，大体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儒教是宗教；二是儒教非宗教，只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核心的学说体系；三是儒教不是宗教，但具有宗教性，儒学具有超越性和终极性以及其它宗教性因素，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宗教的作用但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 ◎佛教传入中国的诸种说法

佛教传入中国之始，除有汉明帝遣使西域求法之说外，尚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三皇五帝之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南朝刘宋时的宗炳在《明佛论》中说：“猥爱之义，亦如来大慈之训矣，故亦闻于三五之世矣。”这里的“三五之世”，指的是三皇五帝之时。

第二，周代已传入佛教。《魏书·释老志》中说：“释迦生时，当周庄王九年，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是也。”周庄王九年，佛教传入中国。

第三，孔子已知佛教。唐朝和尚道宣在《归正篇》中引《列子·仲尼篇》说：“夫子动容有间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据斯以言，孔子深知佛为大圣也。”。



第四，战国末年传入佛教。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05年），有印度“道术人”，“荷锡持瓶”至燕都。

第五，中国在先秦曾有阿育王寺。南朝刘宋时的宗炳在《明佛论》中说：齐国都城“临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处，犹有形像承露盘在深林巨树之下，入地二十丈”。

第六，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众来华。唐朝法琳和尚在《对傅奕废佛事》中说：“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持佛经来化始皇。”

第七，汉武帝时已知佛教。南朝梁慧皎在《高僧传·竺法兰传》中说：汉武帝时，西域人法兰至汉朝传播佛教。

第八，汉成帝时刘向发现佛经。南朝刘宋时的宗炳在《明佛论》中说：刘向在编写图书目录时，曾发现佛经。

以上八种说法，有的明显不符合事实，有的缺少其他证据佐证，都不如汉明帝求法说令人信服。

## 2. 初传时期佛教对儒道的借用

佛教在传入中国的最初一段时间中，积极探索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播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初传时期的佛教主动借用中国传统儒教和道教的思想资源，将来自异域的佛教装扮成中国的样式，以便于中国人接受。

### 《老子化胡经》

#### 《老子化胡经》的由来

《老子化胡经》是道教的一部经典，相传作者是西晋道士王浮，所谓“老子化胡”，就是老子转化成了胡人的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教化胡人。本经的主要内容是：周桓王时，中国有一位叫尹喜的人，降临到中天竺国，借白净夫人之身转世为太子悉达。后来舍弃太子位，入山修道，创立佛教悉昙等经典，被人尊称为佛陀，70年后涅槃。周襄王时，尹喜又回到中国，转世为周朝征臧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向孔子传授仁义道德之说。60年后，老子在昆仑山上成仙。又



### 《孔子将释迦牟尼递予老子》

清代作品。孔子（右）、老子（左），孔子将释迦牟尼（中）交给老子。这幅绘画反映的正是“老子化胡说”

过了 450 余年，老子又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方邻国中，降临为释迦国的太子，后来舍家入道，号为摩尼，讲律、定、慧等法，传播佛教思想。后来佛法又传入中国。事实上，“老子化胡”并不只存在于宗教经典中，《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中都有相似的记载。

对于这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老子化胡经》，虽然后人多认为其内容荒诞不经，但由于它出现于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是佛教借用中国本土的道教资源以利自身传播的例证。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初，要想在中国发扬光大，其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佛教中的“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等说法与儒家“不谈鬼神”的态度、道家“现世现报”的思想都有很大的区别，受到了中国人的非议。

轮回转世的说法是佛教的观念，中国的儒家原本很排斥这种的怪、力、乱、神之说，《论语》中就有“子（孔子）不语怪、力、乱、神”

### 吴康僧会尊者

清代线刻图。康僧会(? ~280年),三国时期译经僧,交趾(今越南北部)人,其先世出自康居国(今新疆北部),世居印度,至其父因经商始移居交趾。康僧会于247年至建业,为孙权所重,造建初寺,江南佛教开始发达



的说法,道家追求长生久视,也不热衷于轮回,在《道德经》中绝对没有转世的说法。因此,《老子化胡经》很可能是佛教人士为使佛教实现中国化而创作的,其目的是在佛教初传中国之时,告诉中国人佛教是老子思想的延续,与中国传统的道家道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从而消弭中国人对外来佛教的抵触情绪。

汉末以来,佛教借用道教资源以利自身传播的做法,不止《老子化胡经》这一例。在据说是第一部汉译佛经的《四十二章经》中,就出现了把佛陀描绘为“轻举能飞”的神人,把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阿罗汉”描绘为“能飞行变化,寿命无限”的仙人。中国佛教徒编的最早介绍佛教的著作《牟子理惑论》中也以道家神仙家之言来解释佛陀,认为“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能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蹈火不烧,履刃不伤”,极似神仙道术之士所讲的“神人”、“真人”。早期来华传教的僧人也常借助于一些道术医方来拉拢信徒,扩大佛教的影响。例如据《出三藏记集》记载,最早来华的译经大师

安世高就是：“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投药必济，乃至鸟兽鸣呼，闻声知心”。《高僧传》也说康僧会“天文图纬，多所综涉”，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讖运变，莫不该综”。由此可见，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往往有意识地迎合并依附道教的种种神仙方术，以利自身传播。

当佛教逐渐被中国人接受，成为中国上下各阶层普遍的信仰后，佛教徒就一改以往迎合道教的做法，开始极力反对“老子化胡说”。唐太宗时，佛教徒要求召开“御前会议”，与道教公开辩论“老子化胡说”。当时的法琳法师，口似悬河，将“老子化胡说”批得一无是处，道教辩论不过他。由于李唐王朝与道教信奉的始祖李耳是同姓，因此唐太宗很不喜欢法琳和尚，就找借口治了法琳的罪，还把他流配远方。到了唐高宗，又召开御前会议，佛、道再进行激辩，道教还是辩不过佛教。于是皇帝下令：搜天下《化胡经》焚弃，不在道经之列。不过朝廷诏令归诏令，执行归执行。上面虽有禁令，下面根本充耳不闻。唐中宗时，佛教再度告御状，要求彻底执行焚弃《化胡经》之令。然而，焚弃《化胡经》的政令不但未得到很好的执行，而且《化胡经》的内容还不断在扩展，由最初的一卷增加到十卷，甚至还演绎出了一些与“老子化胡说”的相关新书。这更增加了佛教徒对《化胡经》的反感。元朝初年，由于全真道道士丘处机很受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崇敬，道教的势力发展得很快。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全真道编辑了一部道教经典全集——



唐高祖李渊

李渊（566～635年）建立唐朝后，为了给李唐王朝增添神圣性，将李氏家族说成是老子李耳的后代，因此极力提高道教的地位。武德八年（625年），李渊颁布《先老后释诏书》：“老先、次孔、末后释”，规定了唐朝儒释道三教的座次



### 《菩萨授经图》

明代丁云鹏 1606 年作。所绘内容为观世音菩萨授经的故事。  
此品自隋至明，历代都有，可见佛教传播广泛

《道藏》。这部《道藏》不仅收录了《老子化胡经》，而且还增加了《老子化胡八十一图》，生动地描绘出“老子化胡”的场景。然而，元宪宗时，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取代道教而成为统治者的新宠。在佛教的推动下，元朝政府下令：各种道教经典，除《道德经》以外，其余文字、版本、图画等，一概焚毁，隐藏者有罪。全真教在元朝初年编辑而成的7800多卷的《道藏》，几乎被焚毁殆尽，其中就包括《老子化胡经》。从此以后，完整的《老子化胡经》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后人只能在道教其他文献中摘录出《化胡经》的部分文句。至此，佛教终于报了《化胡经》之仇，但“老子化胡说”却流传了下来。

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佛教不但对儒教的忠孝节义等思想进行了融合，甚至对道教的养生医术、图讖运命、阴阳五行、拳艺功法等都加以吸收，从而使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不太和中国人基本思想抵触的“中国佛教”。

## 《四十二章经》

《四十二章经》是现存较早的汉文佛经。据说是汉明帝求法时，西域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抵达洛阳后翻译而出，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由于年代久远，关于该经翻译的细节，已经无法考证，近代的一些学者对它的出处存在着疑问。如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曾撰写“《四十二章经》辨伪”一文，指出，“此书必为中国人作，而非译自印度。作者必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过吴，最晚不过东晋”。著名佛教学者吕澂在《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一文中也持同样的观点：“《四十二章经》之为经抄，并非印度现成的结构，而是从一种汉译《法句经》随意抄出来的，所以显得凌乱、疏漏，毫无印度著述



### 佛传故事壁画“说苦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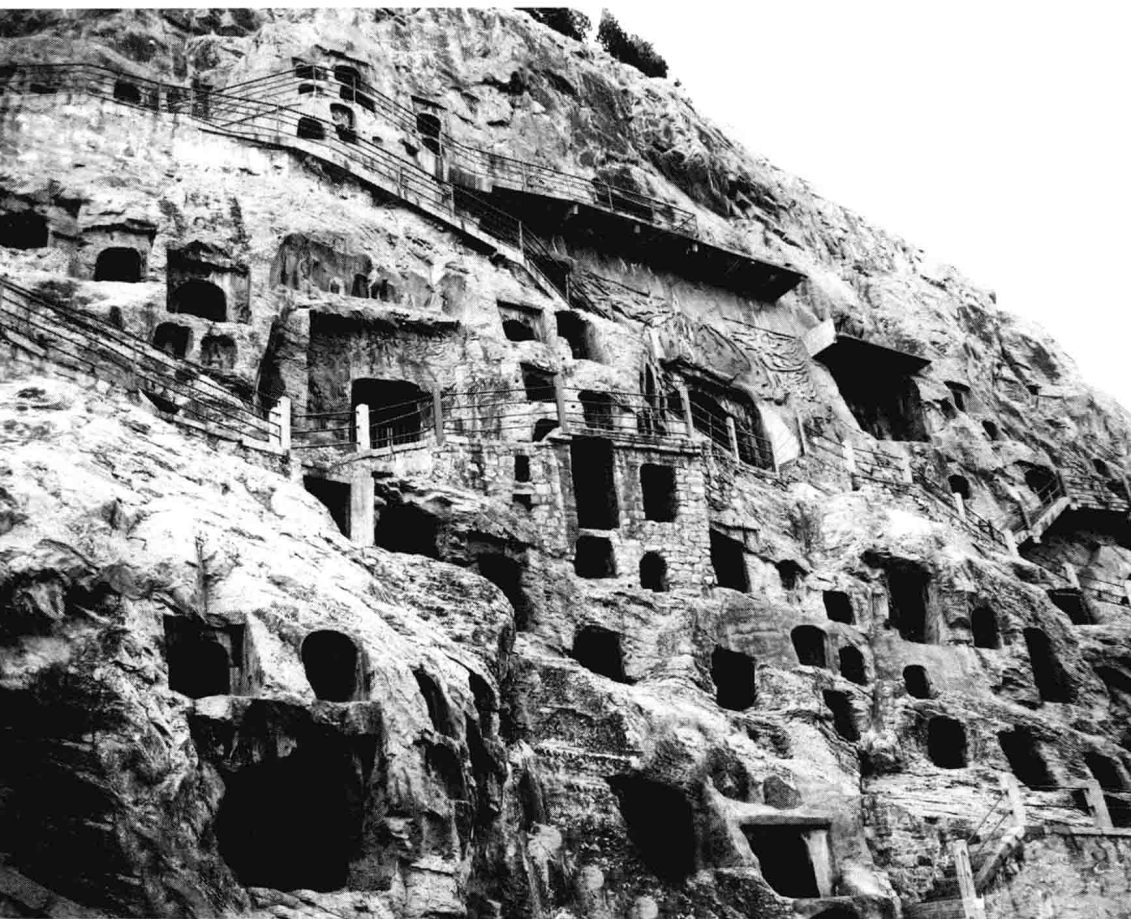
山西太原晋祠奉圣寺大雄宝殿。《法句经》中有一个故事：一日，有四个和尚讨论到底何为世间最苦？一个说是淫欲，一个说是饥渴，一个说是嗔念，一个说是恐怖。四个人各执一言，争论不休。佛知道此事后，说：你们所论之事，并非苦的真义。天下之苦莫过有身。饥渴、嗔念、寒热、色欲、怨祸，皆因于有身而生。身体是痛苦之本



所常有的精严风格。”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四十二章经》成书的具体年代：301年至342年之间。与上述质疑《四十二章经》真实性的观点不同，学术界有很多学者认为该经不是中国人撰写的伪经。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在巴利文及汉译佛经中，可以找到很多该经的内容，因此“可知其非出汉人伪造”。

《四十二章经》主要阐述的是人生无常、爱欲之弊的佛教基本道理，劝告世人放弃爱欲，积极修道，以求得解脱。在说明人生之苦时，该经曰“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自病至死，其苦无量。心恼积罪，生死不息，其苦难说”，要摆脱无尽的苦难，唯有不避寒暑地访道，不惮驱驰地修行，才能彻底摆脱六道轮回、生老病死之苦。在分析苦的原因时，该经说人对爱欲、财色的贪恋是产生人生之苦的根源，所以必须通过修道，远离爱欲。大体而言，《四十二章经》的基本精神不离佛教思想，其文字朴实，以举事说理为主。

然而，作为较早出现的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的价值不在于它所阐释的佛教教义，而在于它反映出在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所采取的适应中国现实的传教方式。这部佛经完全适应了佛教在汉地发展的需要，通过吸收利用儒教的说法，使中国人能够逐渐接受佛教。如此经中包含了儒教孝亲思想，说：“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亲。二亲最神也。然善人中有二种。或能事天地鬼神。或能孝养父母。比量福报不及能事亲者。”普通人崇拜天地鬼神不如孝养自己的父母，即使对佛教徒而言，孝养父母也是十分重要的。此经中强调儒教善恶的原则，说：“人有众过，而不自悔，顿止其心，罪来归身，犹水归海，自成深广矣。有恶知非，改过得善，罪日消灭，后会得道也。”人如果有罪而不知悔改，则罪业会更重。如果有过能改，则罪业就会消失。“恶人害贤者，犹仰天而唾，唾不污天，还污己身。逆风扬尘，尘不



###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等都是在北魏大力弘扬佛教的背景下开凿的

污彼，还玠于身。贤者不可毁，祸必灭己也。”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坏人永远不能害贤人。在《四十二章经》中，类似这样引用儒教观念的话比比皆是。

总之，由于在佛教传入中国之时，儒教思想已经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在此背景下，印度佛教思想必然要适应儒教思想，接受儒教思想的检验。《四十二章经》的思想内容表明，作为最早出现的汉语佛经，它迈出了“中国化”的第一步。由此，《四十二章经》以佛教经典的形式，揭开了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序幕。

---

#### 小知识◎汉魏南北朝时期佛教理论中国化的三种途径

当代学者洪修平教授在研究汉魏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关系时，指出这一时期佛教理论中国化的途径有三种：“方术灵神化、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佛教的方术灵神化主要是说佛教对中国黄老神仙方术的依附和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宗教观念和迷信思想的融合吸收，从而在信仰和行证的层面上为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开拓了道路。佛教的儒学化则主要表现在对儒家伦理名教的妥协调和及对儒家人文精神和心性学说的融合吸收。佛教的儒学化为中国佛教的社会伦理品格和心性学说等奠定了基础，并进一步为文化士大夫接受佛教创造了条件。作为‘哲学的宗教’的佛教还通过老庄玄学化而加深了与中国传统思辨哲学的会通，并藉此正式登上中国学术思想的舞台，突显了自己特有的理论价值。汉地佛教的方术灵神化、儒学化与老庄玄学化是相互联系、并存并进的，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又各有侧重，佛教的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佛教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只有从佛教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影响中，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的特点，也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参见洪修平：《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年版）

## 二 冲突与融合

——魏晋至唐的佛教与儒道

汉朝以后，外来的佛教逐渐在中国站稳脚步，与儒道二教的冲突逐渐显现出来。它们之间因为政治、经济、宗教等原因开始了多方面的冲突。然而佛教与儒道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绝对的，其间也伴随着相互吸收融合的过程。

## 1. 佛教与儒道的冲突

魏晋至唐时，佛教与儒道的冲突形式主要有两种：“文攻”和“武斗”。前者主要体现在南朝僧祐编写的《弘明集》中，后者主要表现为“三武一宗灭佛”之举。

### 佛教与儒道的“文攻”

#### 佛教与儒道关系的转变

经过汉魏时期的传播，到两晋南北朝时，逐渐完成本土化的佛教已经为中国社会上下各阶层的人们所接受，佛教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主要有以下表现：

首先，出家僧尼和佛教信徒的迅速增加。据记载，东晋 100 多年中，新建寺院 1700 多所，宋、齐、梁、陈四代有增无减。北方更甚。北魏承明元年（476 年）时，全国有寺庙 6000 多座，僧尼 7 万多人，10 余年后，寺庙增加到 12000 座，到延昌二年（518 年），寺庙发展到 3 万多座，僧尼猛增至 200 多万人。出家僧尼已经如此，整个社会



梁武帝画像

梁武帝萧衍（464～549年），南朝梁的建立者，在位48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信徒，有“菩萨皇帝”之称

中的佛教信徒更是无法计数。

其次，佛教成为了当时社会中一种日益壮大的影响势力。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后赵石虎曾下诏：佛教传自于西方少数民族，并非汉人原有的宗教，因此匈奴、鲜卑等各少数民族都必须信奉佛教，以便与汉人区别。

这一命令使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皆奉佛教”。后秦姚兴打败后凉，将当时的西域名僧鸠摩罗什迎接到长安，一

时聚集僧众5000余人，使长安成为当时北方的佛教中心，国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信奉佛教，吸引了更多的西域僧人进入汉地传教。南方的梁武帝也是佛教的重要信徒，被称为“皇帝菩萨”。梁天监三年（504年），梁武帝下诏要求王公贵族、公卿百官等都要“返伪就真”，信奉佛教。在他不遗余力的倡导下，南朝佛教很快进入全盛时期，寺院、僧尼数量迅速增加。仅建康一地，就有寺院500余处，僧尼人数也超过10万。他亲自下令修建的寺院就有大爱敬寺、光宅寺、开善寺、同泰寺等数十处。唐代诗人杜牧笔下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描绘这一时期佛教的盛况。梁武帝“舍身”同泰寺，使他崇佛之举达到了顶峰。据记载，他先后曾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有臣下用大量金钱赎回。梁武帝的四次“舍身”之举，虽没有最终使他出家为僧，却使同泰寺得到四亿的金钱布施。

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事实说明，佛教已经结束了最初立足中国的过程，开始成为当时一个日益壮大的社会势力。正因为如此，佛教逐渐转变当初依附儒道的做法，开始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从而使得佛教

与儒道的冲突逐渐增加，双方的“文攻”也日益增多。《弘明集》记载了这一时期佛教与儒道论争的许多文章。

### 佛教与儒道的“文攻”

《弘明集》是两晋南北朝时佛教与儒道之间论争文章的合集，该书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佛教与儒道的关系。《弘明集》的作者是南朝僧人僧祐。僧祐幼年时到扬州建初寺礼拜，与佛教结下因缘。14岁时，家人秘密为其订立婚事。他得知后，坚决辞退亲事，逃到南京定林寺，跟随法达和尚

学习佛教经典。20岁时正式出家，拜当时著名法师法颖和尚为师。僧祐在名师的指点下，再加之自己刻苦学习，终于成为当时学识渊博的僧人。天监九年（510年），郢州（今湖北武昌）头陀道人妙光伪造佛经，写在屏风上，红纱覆盖，香花供养，诱骗百姓信奉。事发之后，南齐武帝邀请僧祐等人，在建康（今南京市）审问其事，论罪定刑，僧祐成为一时名僧。他晚年患上脚疾，武帝常请他乘车入内殿为六宫妃嫔受戒，当时王公贵族纷纷拜其为师。

僧祐之所以要编撰《弘明集》，是因为他认为，佛法是世间少有可能匹及的教法，然而理论过于深奥则少有深入了解者，世人因为不了解就会误解佛教的教义，而产生诸多错误言论不利于佛教的深入开展。



梁武帝舍身佛寺图

出自明刊本《帝鉴图说》。南梁武帝为表忠心事佛，4次舍身入同泰寺，大臣前后耗费四亿钱将其赎出





### 成康之治

出自《瑞世良英》卷一《年考纂》。在传统天下观念中，中原为天下之中，是华夏民族居住的；夷指居住在中原周围的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并称四夷。理想的天下治理模式是：中原百姓安定，四夷来贡，海内晏然，百姓知礼。周成王、周康王治理周朝时形成的“成康之治”，俨然如此

中国人接受、熟悉儒教经典，崇拜圣贤古者，尊天法圣，然而他们的这种信仰仅仅是表面上的、肤浅的崇奉，并没有深入地了解佛教。因此，僧祐为调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编撰了《弘明集》。该书汇集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信仰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言论、论争，朝臣有关佛教之谏论，以及封建统治者对佛教的敕令诏书等。僧祐希望通过这本论集，能让世人较全面深入地认识佛教、了解佛教，以求最终达到信奉佛教的目地。《弘明集》反映出当时人们主要在三个

问题上对佛教有着不同的看法：

首先，夷夏之辨。“夏”是指代表汉民族文化的华夏族，华夏民族多代表中原的汉民族；“夷”是指居住于汉民族周边地区，其语言、生活习俗、文化特点等有别于汉民族的少数民族群体。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中国人很容易的就将佛教作为一种“夷教”来对待。《弘明集》中有一篇顾欢(420~483年)写的《夷夏论》，文章的主要观点是论述道先佛后的观点。在文中，作者巧妙运用了佛教有别于儒教忠孝礼义等道德观念，判定佛教是夷狄之教，不可在中土传播，中土仍应奉行儒教的礼义道德及道教的修行方法，从而达到贬低佛教、打击佛教的目地。文章的用词也十分苛刻，

常常使用“狐蹲狗踞”、“虫喧鸟脂”等词来贬低佛教，以致此文一出，便立即引起众多佛教徒的猛烈反击。在对顾欢《夷夏论》的反驳中，佛教徒的核心观点主要包括：一是认为顾欢伪经捏造佛、道同源，道先于佛之说；二是力证佛教教义高于道教；三是证明佛教教化不分夷夏，世人皆可修佛，不应有夷夏之辨。

其次，因果报应之争。因果报应是印度佛教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果报应主要是说明一个人在自己一生中的所作所为会给死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以及这种后果会对佛教的修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汉传佛教中流传着关于安世高前世因缘的说法。安世高的前世是出家人，当时他有一个同学，瞋恨心特别强，托钵乞食时，若施主不称合自己的心意，往往心怀瞋恨。安世高常常对他诃责和劝谏，但是该同学本性难移，依然我行我素。经过 20 多年，安世高向同学告辞：我必须到广州，了结宿世的业力。你在明达经藏和精进不懈两方面，都远超过我，但是你的本性容易发怒瞋恨，死后一定会投生为丑恶的形体。如果我得道成就，一定来度你。安世高刚到广州时，正值寇贼作乱。走在路上，遇到一位少年，唾手拔刀说：可逮到你了！安世高微笑着说：我前生亏欠你一命，所以千里跋涉，特地前来偿还宿债。你现在非常地忿怒不平，这本来就是过去生所积存的怨气。于是，安世高伸长脖子挨刀，没有丝毫恐惧的样子。那位少年挥动快刀，没有丝毫迟疑，迅速地杀了安世高。据说，安世高的灵魂回到安息国，投生为安息国的太子。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土也曾流行与因果报应相似的善恶报应观念，如《周易》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尽管如此，佛教的因果报应与中土固有的善恶报应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如佛教认为因果报应的主宰力量是人的业力，而中土善恶报应的

主宰力量是上天、鬼神等超自然力。《弘明集》中有一篇何承天写的《达性论》，文章指出，在现实社会中，行善的人不一定得好报，作恶的人不一定得恶报，因此因果报应是靠不住的，君子要以弘扬儒教思想为己任，而不是宣传报应轮回。针对儒教的批评，《弘明集》收录了当时名僧慧远写的《三报论》，文中将报应分为现报、生报和后报三种。现报是现在作业，现在受报；生报是今生作业，来生受报；后报是前生作业，经过二生、三生乃至百生的转世才能受报。因此，只要作业，就等于埋下了报应的种子，一旦条件成熟，报应自然就会表现出来。慧远的《三报论》解决了报应不能在现世一一实现的问题。

再次，神灭与神不灭之争。这一问题和因果报应问题本来属于同一个问题，但它又比因果报应问题更为深入，思辨程度更高，更加涉及到佛教的核心理论，因此，它最终掩盖了因果报应问题，成为当时佛教与儒道论辩的核心。在这场论辩中，代表佛教观点的是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认为精神是生命流转中的主宰力量，它传递无穷，不会消失，所以不是人的形体决定精神的存在，而是精神决定形体的生死交替。对于佛教的这种“神不灭”论，当时的一些人持反对意见，其中以范缜的《神灭论》最为著名。他把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比作刀刃同锋利的关系，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刀刃不存在了，锋利就不存在了，身体不存在了，人的精神也就不存在了。范缜的《神灭论》在当时影响很大，梁武帝认为范缜的观点属于异端，组织佛教方面进行公开辩论，围攻范缜。佛教方面的反对文章很多，《弘明集》中就记载了梁武帝和 62 个大臣反对《神灭论》的言论。

### 《弘明集》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弘明集》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在它之后，佛教扫除了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障碍，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

首先，《弘明集》使中国人深入了解佛教教义，接受佛教教义，使之融入到中国的传统观念之中，成为后世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虽然中国人已经有许多关于鬼神的说法，但它们与佛教的灵魂地狱这些后世耳熟能详的观念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佛教传入后，中国人将这些佛教的观念同中国传统鬼神信仰结合起来，成为后世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展的，便是印度思想的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怪奇异之说杂处，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的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

其次，《弘明集》反应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调节了佛教和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两晋南朝时期的儒释道辩论十分激烈，当事人的三方都不约而同地主张调和融通三教的思想。例如，南朝道士孟景翼说“老释未尝分，迷者分之”，笃信佛教的箫子良说“真俗之教，其致一也”。正是在这种“三教调和”思想的指导下，儒释道三教一边辩论，一边互相吸收对方思想，以利自身发展。佛教中的六道轮回的说法也为道教所吸收，在后来道教的很多经典中，天堂地狱之间的轮回就很平常了。佛教也吸收了道教的一些思想，在被佛教天台宗尊为第二祖的陈朝僧人慧思写的《誓愿文》中就吸取了道教的神仙思想。



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尊者

清代线刻图。慧思（515～577年），南北朝时武津（河南上蔡）人，俗姓李，世称南岳尊者、思禅师，为中国天台宗第二代祖师

## 佛教与儒道的“武斗”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魏晋至唐是佛教与儒道二教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这一时期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不仅体现在僧祐的《弘明集》和之后唐代僧人道宣的《广弘明集》中的辩论文章上，还间接引发了“三武一宗灭佛”的四次政治事件。这四次事件是：444年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574年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废佛；841年的唐武宗李炎禁佛；955年的后周世宗柴荣限佛。这四次事件被后人统称为“三武一宗灭佛”，佛教徒称之为四次“法难”。

### 灭佛之因

任何政治事件的发生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三武一宗灭佛”也不例外，其原因也并不仅仅是因为三教之争。大体说来，这四次“灭佛”的原因有三：

首先，佛道之争。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以高深巧妙的哲学思辨体系逐渐获得皇室、贵族和士大夫的欢迎。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西域龟兹僧人佛图澄来到洛阳，时值晋末大乱，他以预知“行军吉凶”、烧香咒水生莲花等道术取得后赵石勒信服，尊为“大和尚”，地位相当于国师。石勒不但将皇子养于寺中，亲自去寺庙灌佛为儿发愿，而且“有事必咨而后行”，令佛图澄直接参与外灭刘曜、内平叛乱等军政要务。石勒的侄子石虎继位后，对佛图澄是倍加推崇，誉其为“国之大宝”，派大臣朝夕问候，太子诸公，五日一朝。佛图澄一度成为了后赵的精神支柱。西晋皇室贵族中的中山王和河间王、士族官僚中的周嵩和石崇等人纷纷接纳当时的名僧支孝龙、刘元真、法祚



北周武帝宇文邕像

宇文邕(543~578年),字祢罗突,鲜卑族人,在位18年,期间发动了废佛事件

等人。支孝龙的名言“无心于贵而愈贵，无心于足而愈足”得到当时士大夫的盛赞。

佛教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冲击了道教的利益，信仰道教的势力开始着手以政治手段限制佛教的发展。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推崇寇谦之的天师道。他得知寇谦之有法术，就派使者奉玉帛牲牢，邀请寇谦之及其弟子至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在平城南郊立天师道场，重坛5层，集道士120人，每日祈祷6次。后封寇谦之为国师。唐朝禁佛的武宗李炎也是道教的忠实信徒。武宗不但将道教作为精神上的寄托，而且吃仙丹以求长生。会昌五年（848年），武宗感觉身体不适，道士进言修道者得道，需要脱凡胎成圣胎，换凡骨而为仙骨，现在身体不适正是脱胎换骨的表现。武宗深信不疑，病了也秘而不宣，不传太医，不升朝视事施政，次年便一命呜呼。信仰道教的政治势力当然不愿意



#### 恒山悬空寺

又名玄空寺。悬空寺始建于 1400 多年前的北魏王朝后期，历代都有修缮，是国内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

看到佛教势力迅速发展，他们是灭佛的主要推动力量。

其次，儒佛之争。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随着佛教在中土的迅速发展，佛教不仅冲击了道教的利益，而且危及到儒教的正统地位。儒佛之争也是“三武一宗灭佛”的重要原因。北周时废佛的武帝宇文邕尊崇儒教，常常亲自讲解《礼记》，还认为“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而认为佛教来自国外，不应敬奉，说：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似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周武帝以“使天下一统”为己任，不承认自己是异族，反而认为理应废弃夷狄之法

的佛教。

再次，经济原因。佛教传入汉地之后，由于佛教的传统和君主的支持，僧尼不从事生产活动，但又需要大量的物质财富，国家和信徒的布施是佛教的主要经济来源。魏晋以后，伴随着佛教的迅速发展，寺院拥有的财富和占有的土地也大量增加。北魏太武帝禁佛之前，仅洛阳就有寺院 1400 所左右，僧尼数万人，史书记载“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唐武宗禁佛时，历史记载“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全国的寺院居然还有 15 万奴仆。后周世宗柴荣限佛时，全国户籍 219 万户，有 14 万僧尼，约 15.6 户、93 人摊养一个僧人。可见，佛教给国家、社会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鉴于佛教给政府和百姓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士大夫主张限制佛教发展，减轻负担的呼声不绝于耳。初唐的太史令傅奕上疏，揭露佛教“广置伽蓝，壮丽非一，剥削民财，割截国贮”，与朝廷争夺丁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武则天时期的名臣狄仁杰也上疏指责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武则天、唐玄宗时任宰相的姚崇十分赞赏周武帝的废佛，他指责唐时佛教使得“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批评佛教“损耗生人，无益亡者”。这些限制佛教发展，以纾解民困，增加国家财力的呼声是“三武一宗灭佛”的重要原因。

### 灭佛之果

“三武一宗灭佛”对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三武一宗灭佛”规范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式。魏晋以来，



佛教在中国发展迅速，但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僧尼的文化素质低下和戒律废弛。在戒律问题上，北魏太武帝第一次禁佛时，就发现寺庙藏有大量兵器，因而怀疑寺院涉嫌谋反，并且有些僧人吃肉喝酒，甚至替贪官窝藏赃物。唐武宗禁佛的时候，佛教寺院的情况更糟，僧侣鱼龙混杂，长安的寺院几乎变成娱乐场所，藏污纳垢。

“三武一宗灭佛”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契机。周世宗灭佛时规定：男子 15 岁以上能背诵经文百页，或能诵读经文 500 页者；女子 13 岁以上能背诵经文 70 页，或能诵读经文 300 页以上者，方可向本地州府陈状，请求剃度。经官员考试通过者，方可正式剃度，私自剃度要受严惩。周世宗规定的这种考试剃度制度，成为以后各朝管理佛教的基本措施，这一办法无疑有助于提高佛教徒的文化素质。唐代中晚期著名的百丈怀海禅师制定了一套《百丈清规》，除了要求出家人立誓遵守戒律外，还要求僧尼不坐高广大床、不歌舞娼妓、不抹香涂



三十六世百丈怀海禅师

清代线刻图。怀海（720～814 年），福州长乐人，俗姓王，唐代禅宗高僧，中国禅宗丛林清规的制定者，因居洪州百丈山（今江西奉新县），故世称“百丈禅师”

身、不蓄钱财珠宝等。最为关键的是，他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改变了印度佛教受人供养的传统，要求出家人自食其力，不做社会的寄生虫。

其次，“三武一宗灭佛”极大地限制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有助于形成中国儒释道三教共存的文化格局。从 444 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第一次灭佛，到 955 年后周世宗柴荣灭佛，这五个世纪是佛教在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

但每 100 年左右一次的灭佛事件，使得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北魏太武帝灭佛最为血腥，屠杀了大量佛教徒。北周武帝废佛最为彻底，基本上完全取缔、禁绝了佛教。但周武帝并没有从肉体上消灭僧尼，只有极个别僧人自杀抗议。例如，当时宜州出家人道积、僧友等七人在弥勒佛像前绝食七日身亡。唐武宗禁佛对中国佛教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大。武宗不但勒令僧尼出家，而且拆毁寺庙佛像，焚毁经书，使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典籍和人才损失严重。当时在唐朝的日本僧人圆仁也被迫还俗回国，途经扬州时，看到城里僧尼正裹着头，被官府解递回归原籍，官府还拆毁扬州的寺庵，没收寺庙中的寺金、钱物、庄园、佛像等财产。此次灭佛，使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等依赖寺庙和经典的佛教宗派消沉下去，唯有主张山林佛教的禅宗和较少依赖经典的净土宗得以幸存，成为宋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后周世宗灭佛最为温和、理性，虽然没有杀人流血，没有拆寺焚经毁像，但也淘汰了一半以上的僧尼。通过上述四次灭佛，极大限制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未动摇儒教的统治地位，也保留了道教的发展空间，从而使中国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

再次，“三武一宗灭佛”也促进了中国儒佛道三教的融合。“三武一宗灭佛”不仅激化了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也促进了儒佛道三教的融合。周武帝下令禁佛后不久，又下诏：“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这里指出，不管三教九流，凡是能有助于国家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都应该一并弘扬。唐武宗灭佛的主要支持者，时任宰相的李德裕虽然严格执行唐武宗灭佛的决定，但也十分注重三教的融合，兼容并取佛道文化。李德裕镇守浙西时，认为南朝旧寺多名僧，而在寺中寻求懂得《周易》的僧人。上元瓦官寺僧守亮来到李德裕处，李德

裕初见并不敬重他，二人一交谈，方知守亮学识渊博，对《周易》有很深的研究，于是下令在甘露寺设馆舍，请其教授儒生。此外李德裕还写有《赠圆明上人》：“远公说易长松下，龙树双经海藏中。今日导师闻佛慧，始知前路化成空。”这类馈赠的诗作，也反映了他与僧人交往的情况。

## 2. 魏晋至唐佛教与儒道的融合

在三教关系史上，魏晋至唐是儒释道之间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但这一时期也是三教互相融合的高峰。在此期间，无论教内还是教外、无论思想内容还是组织形式，三教之间都相互融合、相互吸收，奠定了后世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基本模式。

### 梁武帝主导的三教融合

凡是涉及到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都离不开政治势力的参与，古今中外皆如此。南朝时期，梁武帝在儒释道三教的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梁武帝其人

梁武帝名叫萧衍，《梁书·武帝本纪》记载，他的家族属于南朝的四大望族之一，传说是汉代名相萧何的后代。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拥戴他的族弟萧道成建立了南齐，因而受到重用，被委任为扬州刺史。

年轻的萧衍因家庭背景而早早进入官场。在随后的日子中，萧衍的军事才华逐渐显现出来。齐建武二年（495年）和建武四年（497年），萧衍先后两次打败北魏的进攻，据说在整理战场时，有人在魏军丢弃的一个“巾箱”内，发现了北魏孝文帝给他前线指挥官的一道命令：“听说萧衍善于用兵，我到之前不要輕易与其交锋。如果能俘获此人，江南则为我所有。”永元三年（501年），萧衍起兵反齐，推翻了年幼的齐和帝，建立了南梁。

### 梁武帝与儒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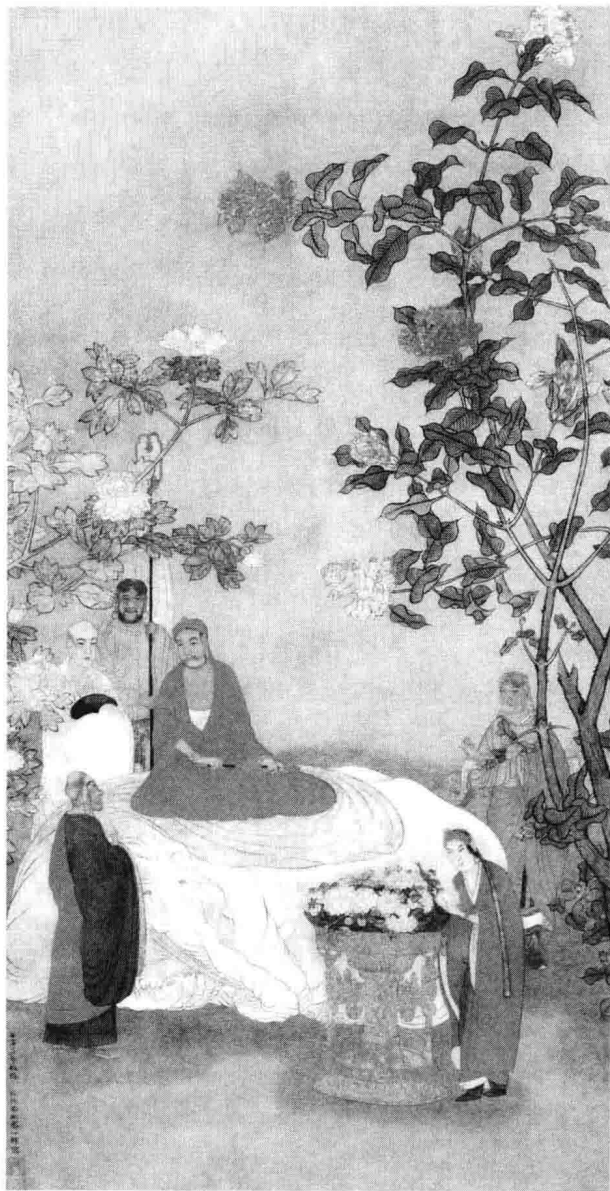
梁武帝之所以极力推动南朝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与他年轻时，游学于儒、释、道三家，对它们有着深厚感情密切相关。

首先，梁武帝与儒教。梁武帝早年曾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南齐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八人彼此唱和，互相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被后世称为“竟陵八友”。他们注重将声律和对偶方面的知识运用到诗歌创作上，所作诗平仄协调，音韵铿锵，词采华丽，对仗工整，体裁短小，为格律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文学史上称之为“永明体”。梁武帝即位第三年（505年），下令按照汉代的模式，设立了五经博士，建立儒学学馆，教授儒学经典。这些博士们，还被派到各州、郡建立地方儒学教学机构。在即位的第十年（512年），他亲自主持制成以儒家精神为基础的《五礼》1000多卷，共计8019条，并颁诏实施。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200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

其次，梁武帝与道教。梁武帝早年还曾一度信奉道教，与许多道士保持着长期的亲密关系，尤其与当时的著名道士陶弘景交往甚密。

陶弘景是南朝一位博学多才的道士，在当时有“山中宰相”之称。南齐明帝在位时，大开杀戒，宗室子弟，尤其是皇家后代几乎被斩草除根。继承齐明帝皇位的东昏侯萧宝卷，更加凶暴，专以诛杀臣民为事。萧齐江山摇摇欲坠。在这种形势下，当身为南齐雍州刺史的萧衍准备反齐却尚在犹豫时，陶弘景暗示萧衍时机成熟，应该迅速行动。当萧衍在永元三年（501年）自江陵起义兵至新林时，陶弘景又派弟子戴猛之奉表以示全力拥戴。当萧衍攻下建康而其主要谋士范云、沈约等国号尚不确定时，陶弘景又引王子年《归来歌》中水刃木处及诸图讖，并称“梁”字为应运之符，这才使萧衍把国号定了下来。萧衍在成为梁代开国皇帝后，陶弘景又为其选择祭祀的良辰吉日。陶弘景死后，梁武帝赠其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派遣中书舍人监理丧事。可见，萧梁统治者对陶弘景的恩宠是无与伦比的。梁武帝即位后，仍然对道教给予大力扶持。南岳道士邓郁为他炼制丹药，他不敢服用，就建起五岳楼贮藏供养，并在道家吉日亲自前往礼拜。天监十四年（515年），邓郁无病而终。梁武帝令周舍作《邓玄传》，详细记载邓郁的生平事迹。

再次，梁武帝与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位皇帝曾与达摩亲自会面，他就是梁武帝。大约在萧梁普通年间，印度僧人菩提达摩自印度航海至广州。梁武帝即刻派使者迎请达摩到建康。见面后，梁武帝自鸣得意地问达摩祖师：我做皇帝以来，建造了很多寺庙，度了很多僧人，请问有什么功德？达摩回答说：没什么功德！只会得一点福报，但如同影子似的，虽有却并不真实！梁武帝听了不太高兴，就问：什么才是真功德呢？达摩回答说：真正的功德是获得大智慧，这不是靠世俗的知见能够得到的。梁武帝又问：什么是圣人的道理？达摩答道：根本没有什么圣人！梁武帝不明白达摩祖师的意思，又问：请问你是谁？达摩回答说：不知道！这下，梁武帝终于忍不住了，话不



《达摩图》

明代吴彬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投机，下令送客。达摩走后，梁武帝听说达摩是真正的得道高僧，想请他回来已经不可能了。之后，达摩在嵩山面壁九年，传法给二祖慧可后去世。梁武帝非常难过，亲自撰写了《菩提达摩大师碑》。

梁武帝虽然起初信奉道教，但登基不久，就在天监三年（504年）正式下诏弃道归佛，说：“弟子经值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梁武帝曾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做一位同泰寺的和尚。第一次是527年，他舍身同泰寺，在寺中住了四天。第二次是529年，被群臣出钱一亿赎回。第三次是在546年，他又去同泰寺舍身，并宣称连宫人和国家都一并“舍”了。结果被群臣出钱两亿赎回。最后一次是547年，这一次他在同泰寺出家37天，最后又被群臣用钱一亿赎回。梁武帝还广建佛寺。他在世时，光建康就有佛寺500余所，其中他还亲自为父母和自己建造了大爱敬寺、智度寺和同泰寺。据记载：大爱敬寺绵延七里，有三十六院，千余名僧人；同泰寺，建筑更为豪华壮丽：“寺有浮屠（宝塔）九层，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余所。东西般若台各三层，大佛阁七层。璇玑殿外，积石为山，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所铸十方金像，十方银像，皆极壮丽”。大智度寺，“殿堂宏壮，宝塔七层，房廊周接，华果间发”。

### 梁武帝推动三教融合

由于梁武帝与儒释道三教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当他建立梁朝以后，大力推行三教融合。他常把佛教比作黑夜里的月亮，把儒教、道教比作众星，彼此既有大小之别，又互相烘托，交相辉映。他指出，儒、道之所以低于佛，是因为它们只能求世间的善；佛教之所以高于儒、





四川峨眉山报国寺三教会宗堂正门

正门楹联“道之源皇人苍玉结屋授九洞经文，佛之始普贤白象踏云率三千徒众”。通过这幅楹联，可以深刻感受到三教合流之意

道，是因为佛教能使人成为出世间的圣人。儒、道和佛有世间和出世间的区别，有凡圣之别。这样他就以佛教为主，把儒道佛三者结合起来，在理论上互相贯通，在实践上互相补充，既用儒、道教人在世间行善，又用佛教劝人出世成佛。如此三者合用，对加强统治是极为有利的，所以梁武帝常把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同称为“三圣”。

梁武帝还写了一首《述三教诗》，充分表达了他对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看法：

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  
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  
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  
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



### 三教图

释道儒三教祖师共坐树下相谈的场景：释迦牟尼（中）、太上老君（右）、孔子（左）。清代丁云鹏作

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  
密行遗阴德，显证在长龄。  
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  
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  
不毁惟平等，至理归无生。  
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  
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  
大椿径亿尺，小草裁云萌。  
大云降大雨，随分各受荣。  
心相起异解，报应有殊形。  
差别岂作意，深浅固物情。

在这首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梁武帝对自己“少时学周孔”、“中

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人生历程的回顾，而且可以发现梁武帝的儒释道三教同源观。在他看来，儒家的“孝义”、“仁恕”是世间基本的道德基础；而道家的“名”与“无名”、“妙术”与“密行”是一种玄妙而神秘的技术；佛家的“苦集”、“因果”、“无生”则是“犹月映众星”。这就是说，儒释道三教的思想虽有着很大的区别，但究其根源只有一个，“三教”中的任何一教，都不应该被放弃。

## 孝亲与事君：佛教对儒教伦理的吸收

尊君和孝亲是儒教的基本主张，但印度佛教并没有这些观念，因此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必须解决佛教信仰与儒教忠孝传统之间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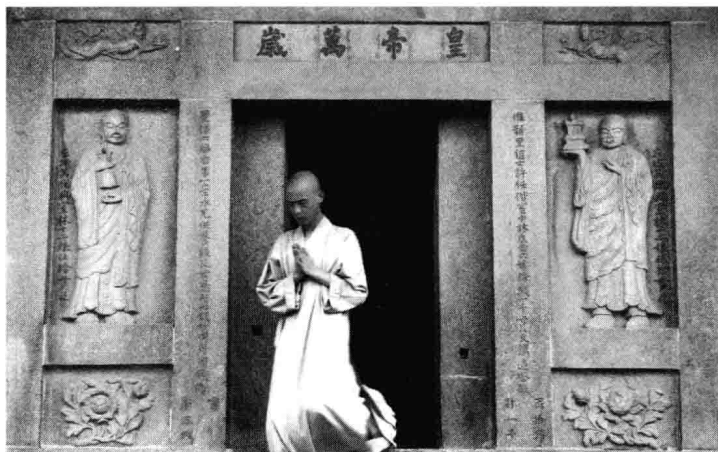
### 出家人是否要礼敬帝王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自己不参与政治，也不支持信徒干预政治，因此出家人对于世俗政权采取远离的态度。在礼仪上，佛教不主张礼拜帝王，见任何人都是合掌致敬，不受世俗礼法的约束。中国有着与印度佛教迥然不同的政治传统。自秦朝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以皇帝为绝对权威的中央集权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人都要跪拜帝王，否则就是僭越。

在东晋初年，权臣庾冰依据儒教的传统，主张出家僧尼必须礼敬帝王。庾冰认为礼制是统治国家的大纲，儒教代表王朝，是绝不可以废的。虽然身为出家人，却也是晋朝的国民，所以，同样也不可忽视礼法，佛教不过是个人心中的信仰而已，应该在国家、朝廷的礼教范围内来弘扬。但是，尚书令何充却主张佛教的五戒是辅佐帝王统治的，

佛法当然不同于怪力乱神，至于佛教信众的烧香、祈祷都是以祈求国家的安定为先，即使出家人不向帝王礼拜，王法也能够完整地实行，因此，不必勉强出家人礼敬帝王。两派各持己见，最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几十年后，出家人是否要礼敬帝王又被重新提起。东晋元兴元年（402年），大臣桓玄和王谧再度讨论出家人是否要礼敬帝王。王谧认为，出家人志在方外，心在道中，不必在形式上屈身礼敬帝王，再加之出家人在礼敬上有内心的体会，只是不愿意在身体上做表面功夫而已。因此像“礼敬”这样的小问题，实在无须去干涉。桓玄十分反对王谧的观点，认为出家人的礼敬虽是在内心，但也讲求礼拜、忏悔等仪式，单单对帝王不拘泥于形式之礼，这样是说不过去的。更进一步说，当



福建省莆田广化寺释迦文佛塔门

塔门上写着“皇帝万岁”四个字，可见历史上，皇权对宗教发展影响之大、之严重

今皇帝是奉佛的，与过去的皇帝不一样，因此出家人要以礼事之。最后桓玄取得了胜利，东晋王朝下令出家人必须礼敬帝王。

桓玄不仅在与同僚的辩论中取得了胜利，而且他还致信当时的佛教领袖慧远，讨论礼敬帝王的问题，试图让佛教界也接受他的观点。桓玄在信中说：帝王与天地等同，王者之道可生万物，王者促成天地的运行，因此要尊重王位。出家人也同受王者的恩惠，所以并没有理由不尊敬帝王。慧远对桓玄的这套说辞并不反对，但他指出，佛教徒分在家的奉教者和出家的修道者两种。在家的奉教者，确如桓玄所说，必须礼敬帝王；但出家人是穷极真理的体验者，有着救度众生的宏愿，出家人的境界更为深远，所以他主张出家人不必礼敬帝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认为佛教与王法对立，更不排斥礼教，只是坚持教



### 剃度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身体发肤来自父母，不能受损。而剃度出家，不仅仅损伤发肤，还要远离家庭父母。这是以孝、亲为主的传统文化难以接受的，也是佛教受到激烈攻击的主要原因

内与教外的区别而已。

桓玄死后，东晋王朝逐渐废除了出家人礼敬帝王的命令，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到了唐朝时，争论再度产生。唐太宗贞观五年正月，公布了命令出家人致拜父母的诏书。由于出家人极力反对，两年后撤销。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再度发布了《命有司议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此诏书规定致拜的对象范围不仅包括皇帝和父母，而且包括皇后和皇太子，诏书发布后，立即遭到佛教界的强烈反对，最后这一诏书被修改为《令僧道致拜父母诏》，只令僧尼拜其父母，而撤回对君王等人的致拜。唐玄宗开元二年，唐朝政府三度下令出家人礼敬帝王。到唐肃宗时，由于肃宗崇佛至极，不再强制僧尼拜君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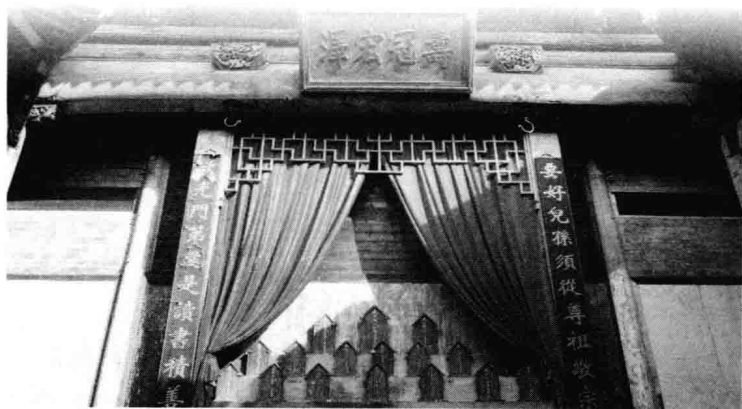
从东晋到唐朝的两三百年中，关于出家人是否礼敬帝王的问题几经周折，虽然佛教在这场斗争中并没有明显处于下风，但从长远来看，佛教坚持不礼敬帝王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它在中国的发展。因为在传统中国，帝王是整个国家绝对的统治者，尊君不仅符合帝王的意愿，也通过儒教的灌输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基本共识，佛教为了更好的在中国发展和传播，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找到妥善的解决之道。这个问题最终在唐朝时得到解决。

### 出家人是否要尽孝道

“百善孝为先”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传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汉朝四百多年的历史中，从刘邦的儿子“孝惠皇帝”起，到汉朝末代皇帝刘协“孝献皇帝”止，绝大多数皇帝在谥号中都冠以“孝”的字眼。可见，在古代中国，孝不仅是一种道德

标准，也是统治者极力维持的统治秩序。但佛教是来源于印度的一种宗教，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出世的精神解脱，因此佛教中的削发为僧、闭世隐退、离家背亲的种种做法，与中国传统的孝道有着很大的不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孝亲成为传统中国人反对佛教的主要原因。

中国传统观点认为“不养为逆”，孝养父母尊长，是孝道最基本的内容。《论语》记载：孔子的弟子子游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一般人认为孝就是能供养父母尊长，但这是犬马等动物也会做的；如果不是以恭敬之心来孝养父母尊长，那么人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可见，在孔子看来，孝养父母尊长是孝道最基本内容，真正的孝道除此之外，还包括更深层次的内容。但按照佛教的传统，出家人必须离开父母妻子，不能事养父母亲长，也不再对家庭承担责任。释迦牟尼



安徽黟县宏村汪氏宗祠乐叙堂（众家厅）

中国人特别重视血脉繁衍流传。祠堂上悬“寿冠宏泽”牌匾，下方摆放的是先人的牌位

尼在创立佛教时，虽然他的父母作了种种劝说，采取了许多防止手段，但他还是乘夜深人静之时，离开了父母妻子，走上了出家修行的道路。从此以后，佛教要求修行者必须出家，以便于摆脱家庭种种俗事的拖累，专心修行。离开家庭，就无法承担赡养父母妻儿的责任和义务，这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挑战，因此佛教的这一传统，在传入中国后就遭到了坚持传统思想的人们的强烈反对。

中国人对佛教还有一点反面看法就是断种之罪。在中国人看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祖宗的香火是绝对不能断的，后代子孙一定要保持祖先的血脉不断繁衍流传。佛教主张出家修行，过佛教所要求的宗教生活，这必然要影响到繁衍子孙，尤其是对那些未婚嫁就选择了出家修行之路的，从世俗的眼光看，就等于断绝了家族的子孙传承之路，这是非常严重的不孝之举，以至于当时人们常常认为佛教有“断种之罪”，这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遇到的最大障碍。

佛教为处理其宗教信仰与中国传统孝亲观之间的对立，在传入中国之后，采用了三种解决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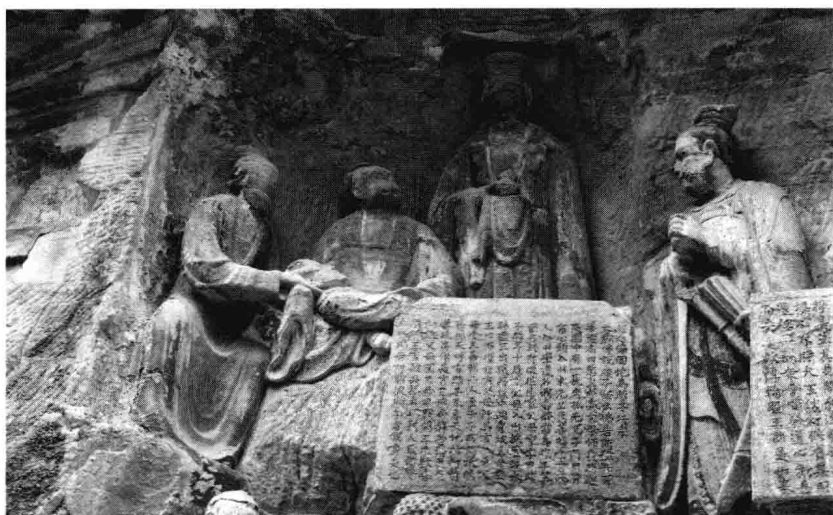
首先，寻找佛教中“孝”的资源，以证明佛教也是讲孝的。佛教并非一概反对孝道，在佛教的一些经典中，也存在着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特别是侍奉父母的故事。例如在佛教的《孝子睽经》中，佛陀讲了一个故事：迦夷国中有一对盲目老人，想入山中修行。菩萨念盲老人入山必遭危害，发愿寿终之后，转生为盲父母之子，名睽子。睽子成年勤修十善，事亲至孝，与父母进山修行。有一天，睽子披鹿皮衣去池中取水，被迦夷国王误射而死。睽子死前想到父母无人赡养，大呼是谁箭杀三人（他自己及其父母）？后来国王悔过，愿留山中奉养盲老人。盲老人知情，仰天号哭，愿代睽死，感动上天，睽子死而复生，盲老人重见光明。佛陀讲完故事后说：“人有父母，不可不孝。”《孟



《兰盆经》中也有类似的救母故事。佛经传入中国后，这些宣扬孝道的经典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佛教徒通过故事说明佛教并不反对孝道。

其次，佛教传入中国后，出现了一些“疑伪经”，重点宣扬孝道。所谓佛经，是指记载佛陀的弟子在其涅槃后，集结佛陀所说话语的经典。如果是后人冒用佛陀所说而撰写的佛经，一般称为“疑伪经”。佛教传入后，为了让中国人易于接受佛教，有一些人冒用佛陀所说，创造了以《提谓波利经》、《父母恩重难报经》等为代表的“疑伪经”。它们试图说明佛法在孝的问题上并不违背中国传统的孝亲观念。例如《父母恩重难报经》中说：“佛言，人生在世，父母为亲，非父不生，非母不育。是以寄托母胎怀身十月，岁满月充，母子俱显生堕草上。父母养育，卧则兰车。父母怀抱，和和弄声。含笑未语。饥时须食，非母不哺。渴时须饮，非母不乳……呜呼慈母，云何可报。”佛陀所说的这段话，以世俗生活的眼光，说明尽孝道的必要，以父母与子女之间温暖的生活细节唤起人们对父母的孝敬之心。正是这些疑伪经的出现，使中国人看到佛教也是尊重认可孝亲观念的。

再次，通过理论上的辩护和宣传，协调佛教教义与传统孝亲观的关系。《牟子理惑论》是中国佛教早期的一部著作，该书用很大的篇幅为佛教不讲孝道的说法辩护。该书认为，看一个人行为的孝与不孝，应当看他的本质，而不能只从表面上看问题。符合道的孝，才是真正的孝行。书中举了一个例子：齐国有一个人乘船渡江，他的父亲不幸落水，那个人救起父亲后，将父亲头朝下颠倒过来，让水从口中流出来，救了父亲的命。如果机械地理解孝道，把父亲的头脚颠倒过来，显然是不孝的行为，但从道的角度看，他这样做救了父亲的命，才是真正的孝行。在佛教看来，出家表面上看来不能孝养父母，但出家是为了弘扬佛法，使世人不再受轮回之苦，因此从道的层面看，出家才是真



经变：《睽子行孝图》（南宋）

位于重庆大足宝顶山。记载了“睽子行孝”这个故事。佛教以此来说明，在“孝”这点上，佛教与传统文化是一致的



《父母恩重经变相图》（南宋）

位于重庆大足宝顶山石刻。是佛家宣说使子女感悟父母恩的经典，在中国流传十分广泛，影响也非常大

正的孝。东晋的孙绰写了一篇《喻道论》，专门为佛教出家违背孝道辩解。他引用周泰伯为了满足父亲让弟弟季氏继位的心愿，就远走他乡，断发纹身，《论语》却称他为至德的例子，说明佛教的出家修行并不违背孝道，而是更大的孝行。他最后说：“佛有十二部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殷勤之旨可谓至矣。”

综上可知，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初，面对在忠孝问题上的挑战 and 责难，佛教采用多种方式予以回应和辩护，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佛教逐渐吸收儒教的伦理纲常，使佛教走向了中土化、世俗化，达成了佛教与纲常名教的契合。这种契合，既是佛教向儒教靠拢的产物，又是中国佛教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 重玄学：道教与佛教思想的融合

### 重玄学产生的背景

产生于东汉时期的道教，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道家神仙、养生之术和神仙信仰。魏晋时期，道教中的神仙色彩越发浓厚，出现了一批据说有法术的大师。左慈就是其中的代表。

左慈，字元放，庐江（今属安徽）人，擅长养生之术，并通晓房中术，从小就喜欢神道秘术。据说他能役使鬼神，隐身遁形。有一次，左慈与曹操在一起吃饭，曹操对大家说：今日高朋满座，山珍海味齐备，只是少了松江（今苏州东南）鲈鱼。左慈应道：这好办。于是要来一个铜盘，贮满水，用竹竿垂钓，很快就钓出一条鲈鱼。曹操拍手称快，其他人很是惊诧。曹操说：一条鱼不够大家吃，能再钓一条吗？左慈再次钓之，不一会儿又钓出一条鱼，长3尺多，活蹦乱跳。又有一次，曹操外出郊游，随从有100多人，左慈准备了一升酒，一斤肉，

亲自为大家斟酌，大家莫不酒足饭饱。曹操感到奇怪，派人探寻其故，到此前的现场一看，那些剩下的酒肉却早已无影无踪。曹操心生不快，想要诛杀左慈，左慈立刻遁入壁中消失不见了。左慈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弟子葛洪就是两晋时期道教中最为著名的人物。

俗话说：“有得必有失。”道教的神仙信仰十分发达，但其理论体系的精深程度却是儒释道三教中较为薄弱的。孔孟倡导的儒家伦理思想，经汉代董仲舒等人的发展，在两汉时期形成了儒教思想体系，在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进一步与道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富有哲学思辨色彩的魏晋玄学。

与道教相比，佛教的理论体系更为博大精深，据说佛陀所说之法有八万四千法门。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事实上佛教的理论体系确实十分复杂。印度佛教有小乘和大乘两大基本派别，大乘又有空宗和有宗；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又因为依据的不同经典和传承体系，发展出律宗、三论宗、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密宗等八宗。相比较而言，道教在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比不上儒佛两家。

在魏晋南北朝佛道的论争中，佛教徒几乎都要贬斥道教理论肤浅、修行体系不规范等问题。伴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论争和交流，道教徒们不但认识到理论体系的缺乏是道教面临新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极大地锻炼了他们的哲学思辨能力，促使他们从理论上进一步提高自己。在这种背景下，吸收佛教资源以发展道教理论体系的重玄学产生了。

### 重玄学的主要内容

“重玄”一词，出自《道德经》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最早对道教重玄学作界定的是唐代的道士杜光庭。他在《道德真经广

圣义序》中说：“诸家稟学立宗不同，严君平以虚玄为宗，顾欢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藏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无为宗，孙登以重玄为宗。宗旨之中，孙氏为妙矣。”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中的各家学术宗旨各不相同，其中以孙登的重玄学影响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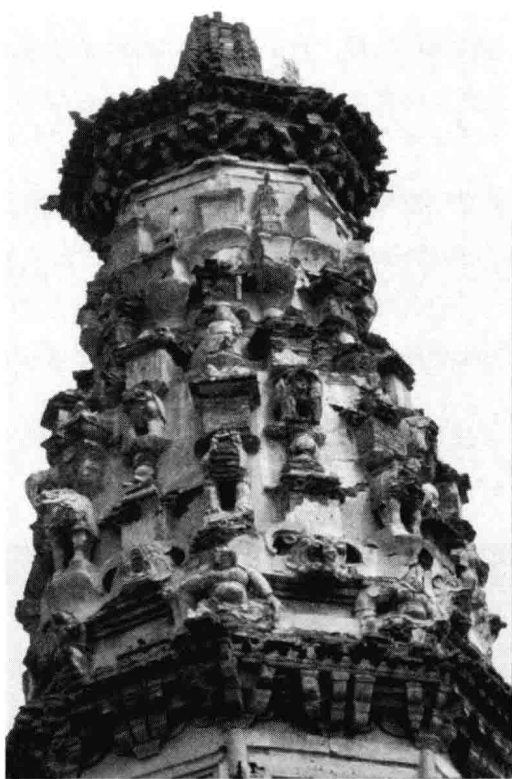
事实上，这种被称为最“妙”的道教重玄学，并非南北朝道教徒们的独创，而是在与佛教争论的过程中，继承老庄思想，借用佛教思想资源的结果。

首先，“重玄”最早是佛教徒解释佛教道理的词汇。东晋佛教徒假借老庄哲学术语解释佛教义理，认为老子所说“玄之又玄（重玄）”可用来解释佛教《般若经》宣扬的诸法性空理论，是进入佛教所谓至无空豁，廓然无物境界的阶梯和途径。因此当代学者卢国龙认为：重



真金写经《大般若经》上的经文

大般若经，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般若经》。为说明诸法皆空之  
义的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现藏于甘肃张掖大佛寺



#### 河北省涿源县兴文塔

始建于唐天宝三年（744年），明嘉靖年间重修。共5层，顶端加莲花宝顶。由于塔层和顶尖均呈斜状而被称为斜刹塔。是中国仅存的斜刹塔。古塔第一层为道教风格，第二、三层则是佛教风格，集佛道两教文化于一体

### 北京白云观文昌殿内的文昌帝与朱熹塑像

民间传说，朱熹是文昌帝君下凡转世。文昌帝君乃天上主宰“笔墨纸砚（读书人升官进爵）”的尊神，在人们的心目中，朱熹就是文昌帝君的化身。因此常有人将文昌帝与朱熹一起供奉



玄学本质上就是以佛学理论解释道家之学的产物。

其次，重玄学的基本方法来自于佛教般若学的中道观。在佛教中，“中道”是指不落“两边”即不二的一种观点和方法。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佛学家僧肇一方面接受了印度佛教中的中观般若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借助于《老子》的有无思想来解释“中道”，形成了“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的“离四句，绝百非”的说法。道教重玄学在理论建构中借鉴了佛教“离四句，绝百非”，建立了重玄学的基本理论模式。

再次，重玄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互相学习、互相利用的局面正式形成。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为了适应中国文化的需要，吸收利用儒道二教的资源。伴随着佛教日益被接受，中国人也看到来自异域的佛教有着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内容，并逐渐开始学习、利用佛教的文化资源。重玄学意味着佛教单向地利用儒道资源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中国本土的道教也开始吸收利用佛教的资源了。



最后，重玄学使得道教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促进了道教的发展。隋唐时期的道教徒成玄英、李荣等人对重玄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伴随着重玄学的发展，隋唐道教摆脱了以往只注重长生和神仙的形象，开始形成了精深的理论体系，从而使得它在唐朝的影响越来越大。唐玄宗曾利用重玄学的思维方式，亲自注解《道德经》，并以政治手段推广重玄学，极大地推动了道教在唐代的发展。

---

#### 小知识◎梁武帝与汉传佛教徒的“断肉食”戒律

在印度佛教中，僧人原本可以食用“三净肉”。佛教传入中国后，依旧认可这一习俗。所谓“三净肉”，就是指不为杀，即不是为了你才杀；不闻杀，即你没有听见或看见杀生之举；不所杀，即不是你杀的。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出家人有吃纯素者，也有吃三净肉者，更有人大酒大肉。梁武帝深受大乘佛教的影响，决定改变出家人吃肉的风气。他专门召集僧尼讨论，论证吃素是佛教早有的戒律。一些出家人还为荤食找理由，如《唱断肉经竞制》就记载了僧正慧超、法宪法师的理由，他们说：“若经文究竟断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肉，此则同尼干断皮革，不得着革屣，若开皮革得着革屣者，亦应开食肉。”梁武帝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亲自撰写了推行吃素的《断酒肉文》四篇、《与周舍论断肉敕》五篇、《唱断肉经竞制》一篇。在他的倡导下，汉传佛教僧人改变了以往食“三净肉”的做法，使素食成为汉传佛教的一个特色。

# 三 合流与辅政

## ——宋至清的佛教与儒道

宋朝以来，佛教与儒教、道教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思想上，儒释道三教逐渐合流，形成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宗教派别；在政治上，佛道二教也开始渗透进国家政治体系之中，对中国封建政治进行辅助。

## 1. 三教合流

三教合流是宋朝以来的基本趋势。宋明理学、全真道的产生，都是三教合流的具体表现，甚至在民间宗教中，也产生了同时祭祀孔子、佛祖和老子的三一教。

### 宋明理学：儒教与佛道的合流

宋明理学是宋明时期产生的，由众多学派构成的庞大思想系统。它的开创者是周敦颐，后来北宋程颐和南宋朱熹建立了程朱理学，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发展出陆王心学。这两派构成了宋明理学的主体。事实上，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佛道的思想资源，甚至可以说，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

#### 周敦颐与佛道

周敦颐素来被学术界认为是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然而他的思想与宋初道士陈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陈抟是宋初一位传奇式的道士。

传说他很早就认识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二人，还参与了他们谋划的陈桥驿兵变。五代后周时期，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掌管天下兵马。一天，陈抟骑驴游华山，听得百姓谈论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的消息，便十分高兴，惊喜大笑曰：“天下从此可定也！”在陈桥驿兵变之前，陈抟与赵匡胤兄弟共饮，共同图谋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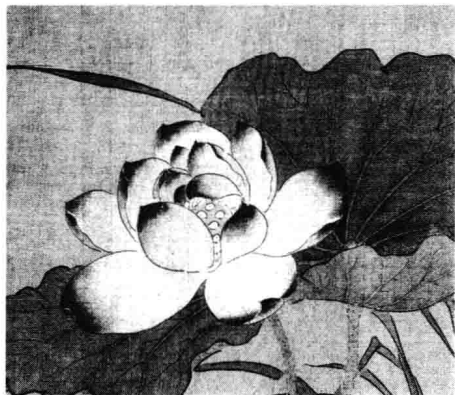
周敦颐画像

周敦颐（1017～1073年）字茂叔，号濂溪，是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赵匡义即位后，作诗称赞陈抟：“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消息杳无闻。如今若肯随征召，尽把三峰乞与君。”赵匡义打算对河北的少数民族用兵，陈抟上书

称此次用兵不会胜利，希望停止，赵匡义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后来的事实证明陈抟所说是正确的，赵匡义因此赐给陈抟“希夷”之号，而历史上也把陈抟称为“希夷先生”。

《太极图说》是周敦颐的代表作。这篇文章虽然篇幅短小，只有200余字，但几乎涵盖了后世宋明理学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这篇文章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据两宋之际的著名学者朱震考证：陈抟创作了道教先天图，传给了种放，种放传给了穆修，穆修传给周敦颐。种放和穆修都是北宋初期著名的道士。种放少年时才华横溢，但不愿参加进士考试。父亲去世后，便和母亲一起隐居在终南山，以教书为业。种放很崇拜华山的陈抟，于是前往拜访。传说一日，陈抟让道童洒扫庭堂，说：今日堂中有佳客前来。种放扮成一个打柴的樵夫拜在庭前，陈抟将他搀起并请上坐，说：您哪里是个樵夫呢？20年后当是一位大官，名闻天下。种放说：我是来向您请道教道义的，不问官禄之事。



《爱莲说》插图

周敦颐在《爱莲说》中，通过对莲的形象和品质的描写，歌颂了莲花坚贞的品格；从而表达了其洁身自爱的高洁人格和洒落的胸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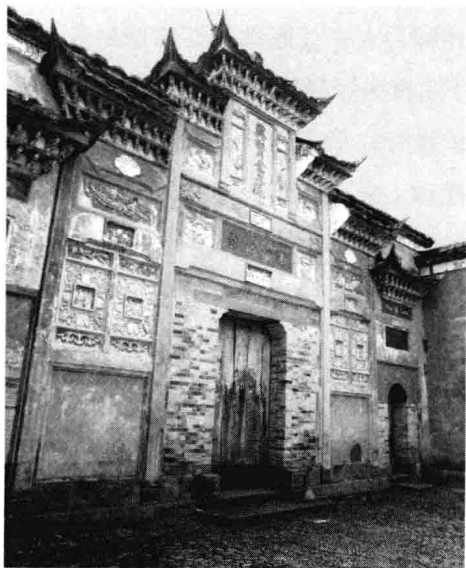
陈抟说：你的命当如此，虽然在山林中隐身晦迹，恐以后还是要身居高位。种放向陈抟请教长生之术，陈抟说：你要寡欲，可活满六十之数。种放最后隐居终南山，终生不娶，61岁而终。周敦颐从陈抟、种放、穆修等道士处得到道教《先天图》，发展出来《太极图》，《图》中描绘了宇宙产生的模式：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这实际上就是《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翻版。

周敦颐不仅与道教的关系密切，而且他的名作《爱莲说》还据有明显的佛教痕迹。莲花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佛教的经典中，常有以莲花为名的，如《妙法莲华经》。佛教中有莲花座之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如来名号品》开篇就说佛陀在摩竭提国，坐莲花狮子座上，并在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等方向设莲花座。周敦颐在文中称

莲花有四种品格：其一，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譬如佛法在世间而不为世间所污；其二，莲花自性而发，譬如佛教所说的自性开悟；其三，莲花为群蜂所采，譬如佛教为众生所用；其四，莲花有香、净、柔软、可爱四德，譬如佛教所说的常乐我净四德。因为佛教爱用莲花作喻，所以有人认为莲花是佛教的花朵；因为莲花成了佛教的花朵，所以有人认为周敦颐的《爱莲说》表现的是佛教思想；又因为《爱莲说》表现了佛教思想，所以有人认为它是《华严经探玄记》的翻版。

### 朱熹与佛道

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对理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有重要的影响。“理学”一词就源于朱熹提倡的“天理”。宋明理学由



福建武夷山的兴贤书院

朱熹出生在武夷山区的尤溪县，该地有大量与朱熹有关的历史遗迹

许多思想派别组成，程朱理学只是其中一派，是指程颐和朱熹建立的，以“天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由于宋代以后程朱理学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将其称为宋明理学。

朱熹少年时即已向佛学佛，直至晚年仍与佛教有着深厚的因缘。朱熹祖籍婺源（今属江西），其父喜爱佛学，与净悟禅师交往甚密，平日在家诵经修行。朱熹的外祖父、舅舅、母亲等都虔诚信佛。受其父的影响，朱熹幼年时就与净悟禅师往来密切。净悟禅师为人言行收敛的性格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成年以后，朱熹交往最多的佛教僧人是道谦禅师。朱熹将道谦禅师送的大慧宗杲禅师的《大慧语录》奉为至宝，精心研读，并且每日跟随道谦修禅习定，闲暇之时就阅读佛经，收获很大。朱熹曾以地道的佛教口吻向道谦禅师问禅，“狗子佛性未有悟入，愿授一言。”这正是道谦禅师最乐于向弟子开示的



华严三祖贤首法藏法师

清代线刻图。《华严经探玄记》的作者是唐朝的法藏。法藏（643～712年），唐代僧人。华严宗实际开创者，宗内称为“三祖”



四十九世大慧宗杲禅师

清代线刻图。宗杲（1089～1163年），俗姓奚，宣州（今属安徽）宁国人，宋代临济宗杨岐派高僧。朱熹早年深受宗杲禅师的影响

话头。由此可见朱熹对佛教是深有体悟的。

后来，朱熹考中建州乡试，次年去临安参加省试。赴临安途中，朱熹行囊中只放了一本《大慧语录》，可见对此十分钟情。在临安考试期间，朱熹专程拜访座落在西子湖畔的天竺寺，认识了寺中法号与自己同号“晦庵”的慧明法师。二人品茶说法，很是投缘。临别时，朱熹作诗《春日游上竺》：“竺国古招提，飞甍碧瓦齐。林深忘日午，山迴觉天低。琪树殊方色，珍禽别样啼。沙门有文畅，啜茗漫留题。”说来有趣，就在这场省试中，朱熹以自己学禅心得应试，竟然考取了。对此，朱熹后来回忆说，“及去赴试时，便用他（道谦禅师）的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随入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朱熹竟然将自己举业的成就归功于学禅。

朱熹后来将注意力转移为以儒学为主导，以维护儒教的正统地位。虽然如此，朱熹对佛教仍有割舍不断的感情。他先后结识了圆悟、嗣公、志南等佛门名僧。圆悟，崇安开善寺方丈。他的《吟梅》诗“独怜万木凋零后，屹立风霜惨淡中”，引起朱熹注意，两人由此相识。圆悟禅师后来盛赞朱熹：“岩岩泰山之耸，浩浩海波之平，凜乎秋霜澄肃，温其春阳发生。立天地之大本，极万物之性情。传圣贤之心印，为后人之典型。”嗣公则是云居院方丈，本是儒生，后弃儒出家。志南禅师是浙江建德梅山寺僧人，精通禅学，擅作诗词。他的名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被朱熹称为“清丽有余，格力闲暇，绝无蔬笋气”。正是这样，朱熹一直到晚年仍涉猎佛学，好谈禅法。

朱熹与道教的交往也十分密切。朱熹在福建崇安居住 40 余年，道教名山武夷山近在咫尺，山中道人便成了朱熹的密友。朱熹在武夷山大隐屏下建成著名的武夷精舍，从基址的选定到构筑管理，都得到了山中道人的鼎力支持。朱熹专门从精舍中拨出房屋，以供道徒居住，



取《真诰》之语，命名为“寒栖馆”。据朱熹所作《云谷记》记载，他与当地道人也有密切来往。每至云谷，众道人就中途前往迎候。他的“休庵”就是购买道士旧居所建，朱熹留宿于此，为陈道人作诗一首，赞其“有道气”。朱熹得足疾，被建阳一程姓道人针灸治愈，为此他专门作诗答谢。朱熹不仅与道教徒来往密切，他本人也直接参与道教修炼活动。他曾经在家中专门修筑一室，作为供奉天尊和修炼的场所，每天焚香礼拜。朱熹对道教的典籍有很深的研究。朱熹认为道教的重要经典《周易参同契》“词韵皆古，奥雅难通，读者浅闻，妄辄更改，故比他书尤多舛误”，于是对比各种版本，详加考订，撰成《周易参同契考异》，对其内容作了阐发。他考证了道教《阴符经》的流传过程，又为之校订，作《阴符经考异》。

### 王守仁与佛道

王守仁继承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开创了明代心学。王守仁号阳明先生，因此历史上又将明代心学称为阳明心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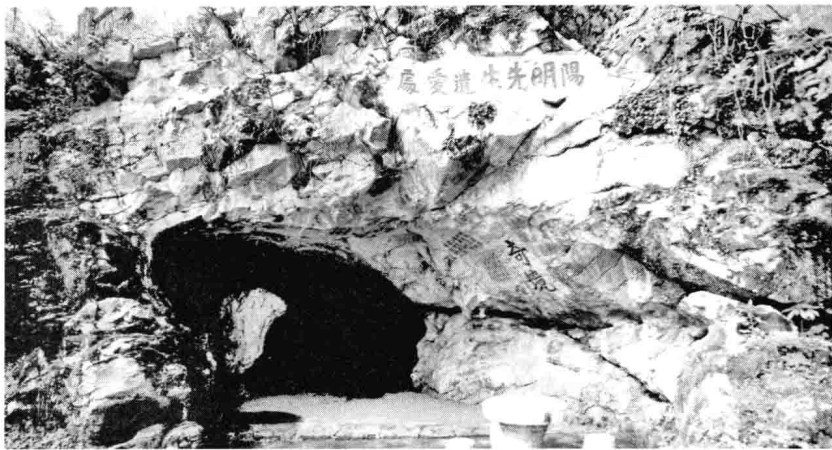
在宋明理学家中，论及与佛道二教的交往，无人能超过王守仁。11岁的王守仁随父亲住在北京。一日，他与同学走在长安街上，遇见一个算命的道士。道士见到王守仁后说：你要记住我说的话：当胡须长到衣领时，你就可以入圣境了；当胡须长到胸口时，你就可以结圣胎了；当胡须长到腹部时，你就成圣果了。说罢，道士就飘然而去。此后，王守仁常常思索道士所说，但一直不得要领。事实上，道士的这番话概括了王守仁的一生。30多岁时，王守仁在贵州龙场悟道，开创了阳明心学，可谓“入圣境”；40多岁时，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

为明朝的安平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谓“结圣胎”；61岁时，王守仁病逝于广西，可谓“成圣果”。

弘治十五年（1502年）五月，王守仁因为厌恶京城人疯狂地追逐功名利禄，告病回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王守仁游历楚地，创作了一系列诗赋。在这些作品中，表达了他对道教的信仰。《九华山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该赋用大量篇幅描绘了九华山的仙境，在结尾，王守仁表达出了自己对成仙的道教追求：我将骑上日月，用鞭子抽打风霆，披上九霞做成的翠袍，在北溟与鲲鹏的翅膀进行搏斗，到海外仙山钓取巨鳌；然后到昆仑山休息，聆听王母的云璈所演奏的音乐；最后，还要从浮丘公那里把正在修道的子乔叫来，从茅山那里把三茅真君请来，让他们与我一起在碧空中遨游逍遥。

正德元年（1506年），王守仁因得罪了宦官刘瑾而入狱，后被谪贬贵州龙场驿，从此开始了他荣辱相伴的后半生。在人生的逆境中，王守仁开始接触、接受佛教。在贵州时，王守仁第一次，也是惟一次为佛经作序，即《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在《序》中，王守仁一方面描述了自己困居贵州，身心都十分疲惫，另一方面他对佛教的态度较往常大为缓和，已经开始逐渐接受佛教的观念，不再像以往认为佛教是祸乱儒教伦理纲常的罪魁祸首。王守仁与僧人的交往也十分频繁。他在与僧人的赠诗中说道“老僧熟认直呼姓”、“诗留佛壁作灯传”。

正德七年（1512年），王守仁与日本僧人了庵桂悟还有一段交往佳话。当年，日本遣明使团正使了庵桂悟以87岁高龄，经过了两年准备率使团到达浙江宁波。了庵一行50人原打算经山东、直隶等地前往北京觐见明武宗，但由于上述地区流寇出没，无法成行，不得已改道苏州，停留半年后至南京拜领皇帝赏赐。后得武宗器重，被任



贵州修文县栖霞山阳明洞

王阳明谪为龙场（今修文县城）驿丞时，于正德三年（1508年）曾居于此洞而得名。其“致良知”、“知行合一”等重要思想及一些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在此“悟”出并写出

命为宁波阿育王山广利寺方丈。正德八年六月，了庵从宁波返回日本。此时，王守仁正在宁波。于是，他作《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序》中记述了二人讨论佛教理论的情形，并且涉及了儒佛异同等问题。从整篇文章看，王守仁十分欣赏了庵的风采，会晤的气氛也很和谐。

以上，以宋明理学中的周敦颐、朱熹、王守仁三人为例，说明了理学家们与佛道二教的密切往来。事实上，理学与佛道之间的关系绝不仅限于此。理学家们在与佛道二教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将它们的思想资源融入到理学中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宋明理学。历史上，人们也把宋明理学称为宋明“新儒学”。这里的“新”，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理学吸收利用了佛道二教的思想资源，使其产生了与先前儒学十

分不同的内容。例如，程朱大谈的“天理”，就融合了佛教华严宗的思想，周敦颐提倡的道德修养方法“静坐”，与道教的静修之法有着莫大的关系，王守仁的“致良知”与佛教禅宗的关系更是扯不断、理还乱。总之，宋明理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三教合流的产物。

## 全真教：道教与儒佛的合流

宋代以来，儒释道三教合流成为基本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儒教中的体现就是宋明理学的产生，在道教中的体现则是全真教的诞生。

### 全真教的建立

全真教的创始人是王嘉。王嘉，原名中孚，字允卿，金朝京兆府终南（今陕西终南县）人，文武双全，早年参加过文科举和武科举。宋金议和后，他的家乡划入金的版图。王嘉后来任金朝终南县甘河镇酒监，专管一镇之酒税，后因官场不得意，便辞官解印，终日醉酒。醉后常被人绑在桥栏上，任其叫喊，无人扶救。邻里称他为“害风”，他亦欣然应喏，且半醉高吟：“昔日庞居士，如今王害风。”正隆四年（1159年）的一天，王嘉正在甘河镇酒馆喝酒，忽见二位道人身披毡裘，自南而来，面貌形体与常人不同。王见二道士后，尾随至僻静处俯身便拜。二道士说：“此子可教也！”于是秘密地授之以真诀。从此改名王嘉，字知明，号重阳子。他在邻近的南时村挖一墓穴，深丈余，高数尺，取名“活死人墓”，上书“王害风之灵位”六字牌匾，挂于房间的正中央。又在房屋四角各植海棠一株。王嘉在墓中独坐静思，研读道士传给他的秘文。据说他悟出了俗世尘缘与真空仙境的差别，懂得了前世善恶与今生报应等道理。大定七年（1167年）四月，

王嘉一把火烧了自己的茅庵，到山东传教去了。在山东，王嘉收了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位著名的弟子，后来被称为“全真七子”，全真教得到迅速的发展。

虽然王嘉创立了全真教，但此时的全真教影响尚小，使全真教壮大起来，成为道教中重要一派的是他的弟子丘处机。丘处机很有政治头脑，在金末的乱世中，他敏感地意识到北方刚刚兴起的蒙古人的前途，遂带着 18 位弟子前往觐见成吉思汗。此时，成吉思汗在攻打不花刺城（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利），丘处机等一路西行，在西亚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问：“真人来此，可有长生之药？”丘处机回答：“有延年益寿的方法，无长生之药。”丘处机先后三次为成



《王重阳祖师和全真七子图》

壁画，现存于湖北武汉黄鹤山（蛇山）长春观七真殿内。长春观是我国道教著名十方丛林之一，为历代道教活动场所，被称“江南一大福地”

吉思汗讲道：一是天道好生恶杀，爱惜生命，不要杀戮；二是清心寡欲，固精养神，积善修福以延寿命；三是中原地美物丰，为兵家要地，经略得当可成霸业。

从此之后，丘处机在成吉思汗处获得三大特权：一是出家的全真教徒有豁免税赋差役的特权；二是天下的道教事务皆归全真教管辖；三是全真教可以任意建立道观，不受限制。成吉思汗赐予的这三大特权，不仅为丘处机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也给全真教带来了大发展的机遇。



《雪山应聘图》

清代作品。该画描绘的是丘处机偕弟子尹志平等 18 人，于 1220 年远涉中亚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会见成吉思汗的情景



大道院内的儒、释、道神像

大道院位于河南灵宝市函谷关，又名太初宫；原为纪念老子在此著《道德经》而成，历代有修葺。儒释道三教祖像供奉，可见三教合流影响之大

自王嘉创教以来，短短几十年间，全真教成为北方道教执牛耳者，之所以能如此，重要原因在于全真教顺应唐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趋势，贯彻“三教搜来作一家”的原则，融合儒释道三教的精华于一炉。

### 全真教中的三教同源

王嘉创立全真教时，特别提倡儒释道三教同源、三教平等。他认为三教创设的目的都是为了拯救世上的一切有情众生，佛教的释迦牟尼教人摆脱六道轮回之苦；道教的太上老君教人炼丹，去除疾病；儒教的孔夫子教人仁义礼智信。他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因此，三教的

开创者都是全真教的祖宗。

对于儒教的思想，全真教特别注重行孝忠君。王嘉规定对“不孝”、“不敬”、“不善”三种人不予传授教法。初收弟子时，令他们读儒教的《孝经》，并以“忠君王、孝父母”作为修炼的前提。要求在家修行的全真教徒与亲属和睦、朋友有信，并祭祀祖宗。对师徒之间的尽孝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条原则：见师父有危险时，要舍命相救；师长打骂时，要笑脸相迎；供养师父，要美食先奉师父。这完全是儒教中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翻版。王嘉还特别重视“忠君王”，维护封建统治。马钰入教时，王嘉要他立誓：“遵依国法为先”。他的侄子王七哥参军，他寄诗叮嘱：“遵依国法行思义，谨守军门护甲戈，先人后己唯长策，宁看归来唱凯歌。”

全真教还充分吸收佛教的六道轮回、地狱惩罚等观念，以丰富其宗教信仰体系。在佛教中原本有地狱之说，中国人将佛教的这一观念具体化为“丰都鬼城”，经明清小说的渲染，更加神秘怪诞。鬼城仿阳间司法体系，营造了一个等级森严，融逮捕、羁押、庭审、判决、教化功能于一炉的“阴曹地府”，惩治生前作奸犯科者。王嘉将“丰都鬼城”的传说纳入到他的道教理论中来：丰都路上，设一个凌迟处，安排了镬汤、刀山火海，又有小鬼拿着生死簿，到此便要受地狱轮回之苦。佛教中还有“火宅”之说。佛祖释迦牟尼在《法华经》中，为了教导众生和信佛弟子脱离三界之苦，走上大乘佛教的修行道路，讲了《火宅喻》这个故事。一位富有的长者拥有一座华丽的庄园。一天，庄园突然起火，房屋宅舍开始燃烧，可长者的二三十个年幼的子女还在着火的庄园房舍里玩耍。长者为了将贪恋庄园的子女引出庄园，对孩子们喊道：“外面有你们喜欢的珍宝玩物，稀奇罕见，你们赶快去拿吧！”于是，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一齐向门外奔跑，个个都跑出了大



火燃烧的庄园。王嘉的弟子刘处玄借用了佛教的这一譬喻，把人世间描绘为众苦煎迫的“火宅”，呼吁百姓不要贪恋俗世生活，皈依全真教获得解脱。

全真教模仿当时佛教的做法，创立了道士出家、云游、住庵、乞食制度。全真教教团创立之初，尚无本派宫观，道士们有的住在旧道观和闲屋破房中，有的自己盖房居住。随着教团的发展，全真教借鉴佛教寺院的建筑体制，修建自己的宫观。丘处机之后，全真教在北京建立了白云观，作为统管全国全真教的中心。现在白云观是全国道教协会所在地。王嘉之后的全真教掌教马钰规定，道士们出家，须离乡



北京白云观正门

白云观创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成吉思汗十九年（1224年），全真龙门派创始人邱处机在此掌管天下道教。白云观历经多次修缮而成今日规模，且素有“道教全真第一丛林”之称，现为中国道教协会所在地

远走，以利斩绝尘缘，还要云游参访。这种云游参访之制，显然取之于禅宗。全真教还仿照早期佛教僧团的乞食制度，提倡道士乞食为生。马钰、丘处机等人出家后，王嘉即携带他们上街乞食。后来教团壮大，建立了本派观庵，道士们又效仿禅宗农禅之制，耕田自养，有的宫观还赈济贫民。

总之，全真教顺应三教合流的时代思潮，继承道家、道教清静无为之旨，融摄佛教六道轮回、因果报应、普度众生等观念，效仿佛教丛林制度、出家形式，采纳儒教伦理思想，组织成一套具有独自特色的、内容较为丰富庞大的教义教制体系，从而使自身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当时，乃至后世中国重要的宗教组织。

### 三一教：民间宗教中的三教合流

从东汉末至宋、元、明，人们大多主张三教合流，但限于言论者多，付诸行动者少。明代的林兆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创立了以归儒宗孔为宗旨，以三纲五常为根本，以士农工商“四业”为媒介，以维护封建伦常秩序为目的的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宗教教派——三一教。三一教，顾名思义，就是以三教合一为宗旨的宗教教派。

三一教的创始人林兆恩本是一名儒生，连续三次乡试落第的打击使得他走上了逃避科举、归隐山林的道路。后来他研习佛、道的经典，对道教的丹法犹感兴趣，而儒家，特别是王守仁心学对他的影响是主要的。所以，当他最初创建三一教时，基本上是按儒教的礼仪规范，但他又不固守儒教，而是努力揉合儒释道于一炉。随着其主张的逐步付诸实践，一大批融合三教的祠堂、会所、会馆相继建立，祠堂中供奉着孔、老、释和林兆恩的塑像。林兆恩生前足迹遍闽、赣、江、浙、湘，

弟子、信徒遍及全国，称得上“门贤”的就有 800 余人，在当时影响江南大部 and 江北部分省区。他去世之后，民间信徒纷纷为之立祠建庙，备受时人推崇。依据 2000 年统计资料，日前在莆田地区仍有三教祠堂 1285 座，信徒 81540 人，在港台和东南亚至今还有重要影响。

### 三一教与儒教

林兆恩的创教传道活动正处于王守仁心学盛行的明嘉靖万历年间，他是从其祖父林富那里接触到王守仁心学的。林富任南京大理寺评事时，与王守仁一道因得罪太监刘瑾而入狱，两人在狱中患难与共，时常一起谈学论道。林富、王守仁出狱后均得朝廷的重用。嘉靖七年，



三一教的信徒在举行庆典仪式

摄于福建莆田涵江鳌山村。农历六月十六，按地方风俗是观音菩萨的诞辰之日，人们举行庆典以纪念观音菩萨

林富协助王守仁镇压了八寨瑶族起义。王守仁病重后，推荐林富接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命都御史，总管两广军事。嘉靖十一年（1532年），林富辞官归乡，在东岩山设立讲坛，宣扬王守仁心学。林兆恩一直是在林富的教导下学习儒学，直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林富去世。嘉靖十八年以后，林兆恩与王守仁的弟子常有往来。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林兆恩前往江西拜见王守仁的著名弟子罗洪先，两人常有书信来往。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林兆恩在给罗洪先的信中介绍了自己放弃儒学，创立三一教的经过。从林兆恩的身世、交游而论，他受到儒教的影响应当是毫无疑问的。

### 三一教与佛教

林兆恩创立三一教的福建莆田是佛教兴盛之地，位于其西南郊凤凰山的广化寺（又称南山寺），规模宏大，至今仍是一座重要佛教寺院。林兆恩早年放弃读书科举之后，寄身于广化寺数年。在此期间，他熟读佛教，尤其是禅宗的经典。林兆恩常引用的佛经有《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著有《金刚经概论》、《心经释略》和《心经概论》等，偶尔提及的有《圆觉经》、《弥陀经》、《楞严经》、《大慧语录》、《维摩诘经》、《庄严经》等。在佛教人物中，林兆恩最为推崇的是禅宗六祖慧能。慧能提出“顿悟成佛”的说法，认为实现成佛的途径只能是到“心”中寻找本性，只要懂得见性成佛的道理，不必注重一切外在的宗教形式，就可以顿悟成佛。林兆恩特别推崇慧能这种说法。林兆恩常引《六祖坛经》以解说开悟的智慧法门。在他写《坛经训释》中，取六祖慧能的词汇最多，有“本心”、“本性”、“自性”、“自心”等，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在三一教中的作用。



福建莆田广化寺的“南山广化寺”牌坊

林兆恩曾在广化寺苦读数年，最终创立“三一教”

### 三一教与道教

道教在林兆恩创立三一教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儒释二教。张三丰（或称张三峰）是元末明初的一位传奇式道士，曾幽居武当山，行踪莫测。明太祖、明成祖曾多次遣使寻访，均无结果。英宗时，封张三丰为“通微显化真人”，宪宗时又封为“韬光尚志真仙”，世宗时更封为“清微元妙真君”。张三丰在明代享有很高的声誉，民间崇奉他的人很多。在三一教中流传着林兆恩与张三丰有直接的师承关系的说法。虽然这一传说不合历史事实，但林兆恩是张三丰的崇拜者，是确定无疑的。林兆恩在隆庆三年（1569年）和万历十一年（1583年），不畏路途艰难，两次前往武当山，虽因各种原因中途而废，但他的目的除了参拜道教圣地武当山外，还要寻找张三丰的足迹。林兆恩还把张三丰的著作《玄歌》和《玄谭》附在自己的著作之后，并说它们是张三丰下凡面授，并郑重地介绍给自己的信徒。

还有另外一位著名道家人物卓晚春与三一教具有密切联系，他是莆田、仙游一带传奇式的道士，明嘉靖年间人，自号无山子、上阳子，人称仙子或小仙。他自幼丧父，随母从柳营嫁往南渚林，6岁继父去世，8岁丧母，因无依无靠而行乞。据有关书籍记载：卓氏天资聪敏，不识字而能诗，又善草书。行为超凡不俗。虽无尺寸之帛，所穿之衣随时脱下赠予别人；虽无升



张三丰像

张三丰，原名全，一名君宝，别号张邈遯，辽东懿州（今辽宁阜新）人，明代著名道士，武当派开山祖师。据说张三丰活到170岁才仙逝

斗之粮，别人邀请而不合其意，即使是美酒珍羞也不愿往；虽身无分文，只要有钱就常常救济穷人。达官贵人求见，他必视之如百姓。少年时，冬天天寒地冻，必露宿于石头上，身着黑麻布裙，头戴青纱帕子，赤脚行走。长大以后，虽然有棉衣穿，但冬天还在溪谷中洗浴。由于他的种种异常举动，成为当地的名人。卓晚春不谈妖说怪，不娶妻生子，提倡清修苦练，对北宋著名道士吕洞宾和南宋著名道士白玉蟾十分敬仰，因此他当属于道教的内丹派。卓晚春在林兆恩创立三一教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说，林兆恩的“九序”功法中前五序是卓晚春传授的。三一教徒特地建无山宫专门祭祀卓晚春。现存卓午祠（三教祠）的一楹联写道：“教之所由生于明夏，道复明耀继自晚春。”这也反映了卓晚春在三一教中的地位。

可以说，林兆恩是古代中国三教合一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我国历史上三教合一的思想，而且对古代宗教进行改革，创立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宗教。他去世以后，追随者不断将其神化，他逐渐成为教徒祭祀的宗教主。明末以来，三一教得到进一步发展，教规、教仪、教阶制度日益完善，使其最终演变为中国的一个民间宗教。

## 2. 三教辅政

在中国历史上，儒教是汉以后的正统封建统治思想，但宋朝以来，统治者开始认识到佛教和道教在维护封建统治中的作用。这一时期的皇帝们纷纷开始利用三教以维护王朝的稳定。

### 宋孝宗的三教观

宋朝的皇帝大多尊崇佛道二教，以南宋孝宗为最。灵隐寺是南宋都城临安的一所重要寺院，寺中有一位慧远和尚。有一天，宋孝宗在选德殿接见他，问道：如何才能免除生死之苦？慧远答：不悟大乘佛教的道理，是不能免除生死之苦的。宋孝宗又问：怎样才能悟大乘佛理？慧远答：本来具有佛性，再加上日积月累的磨练，自然能悟。宋孝宗接着问：“悟后如何？”慧远答：“悟后始知今日问答皆非。”宋孝宗对慧远的答话表示满意，给了他很多赏赐，并赐予慧远“佛海禅师”的称号。宋孝宗与道教的交往同样密切。有一位从北方避难到临安的道士莎衣道人，据说很有能耐。一天晚上，宋孝宗梦见莎衣道





灵隐寺大门牌匾

灵隐寺是中国佛教著名寺院，又名云林寺，位于浙江杭州西湖西北面，是江南著名古刹之一

人哭着给他吊丧，孝宗问他吊丧的原因，他不肯说明。醒来后，孝宗对梦中之事百思不得其解。不久之后，太子病逝，才知道前些日子所作之梦为何意。孝宗遣使召之，莎衣道人不肯进宫。孝宗念及太子之位空虚对国家稳定不利，自己又没有其他的儿子，于是焚香祷告：“哪位仙人能实现朕的愿望，朕必将举国供奉之。”不久莎衣道人就来拜见孝宗，说：“有中国即有外国，有日即有月，不必问，自会有。”说罢就离去了。孝宗认为他很神奇，赐号通神先生。



宋孝宗赵昚像

赵昚(1127~1194年)，南宋皇帝。  
1162~1189年在位。赵昚与佛  
道二教交往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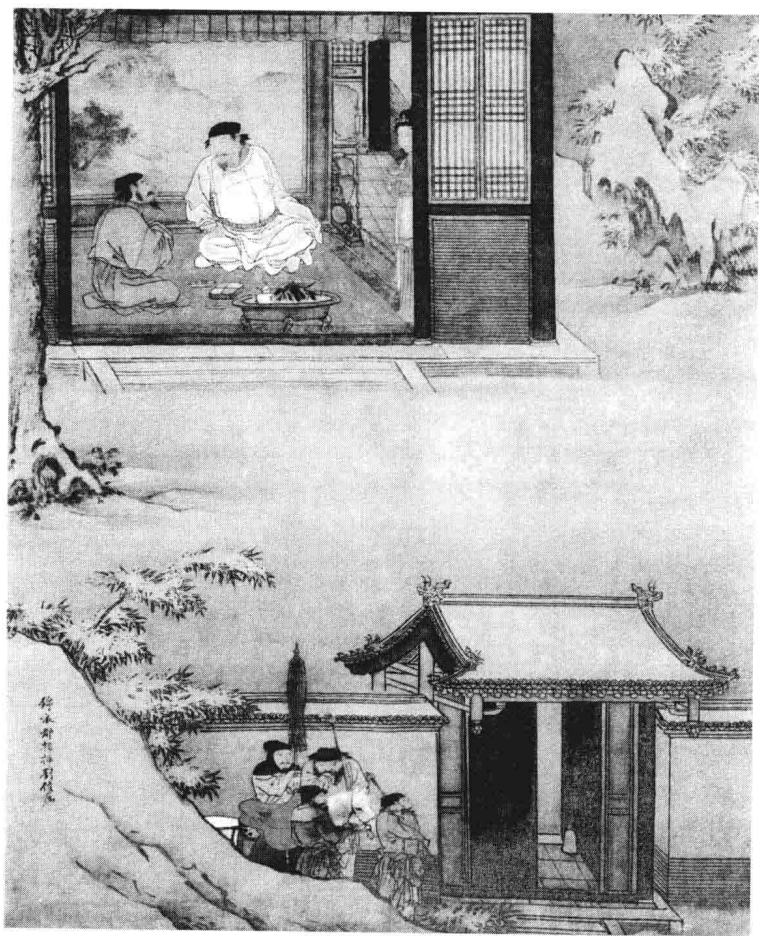
由于宋孝宗与佛道二教都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他在政治实践中，特别注重发挥二者的作用。在宋孝宗眼中，儒释道三教在国家统治中发挥着相辅相成的作用，用他的话就是：“以儒家治世，以佛教养心，以道教养生”。

首先，以儒家治世。自从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国家、治理百姓的指导思想。西汉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了“春秋决狱”的法律思想，就是用孔子编写的《春秋》，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也就是说，除了法律外，还可以用儒教思想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西汉时，有一位父亲和别人因口角发生斗殴，对方用刀刺父亲，儿子拿棍子相救，结果误伤了父亲。按照当时的法律，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要按律处死。但是董仲舒根据《春秋》中的说法，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而是在孝敬父亲，不用按律判以重罪，而应无罪

释放。最终，儿子没有按照法律来制裁，而是按照《春秋》来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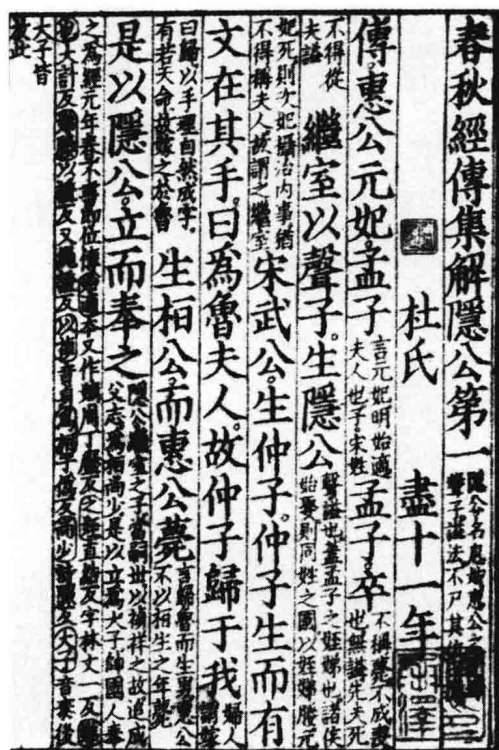
唐宋以后，儒教的地位较前朝有所提高，儒教知识分子在国家中的地位比以往更高。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自立后，曾立一石碑，其上刻有“约法三章”，要求后世子孙在即位时，均要对此碑立誓遵守：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罪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两宋十八代君主，基本上遵守了这一誓约，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少杀戮大臣，儒士不因言获罪的朝代。北宋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是“以儒家治世”理念的最好说明。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是建立北宋的功臣。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义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恰当。宋太宗不以为然地说：赵普读书不多，这我一向知道。但说他只读一部《论语》，我也是不相信的。有一次宋太宗和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超出《论语》这部分。过去臣以半部《论语》辅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辅助陛下，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篋，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语》。可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教的思想是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

其次，以佛教养心。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之初，他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人的思想和精神如何解脱。据说，释迦牟尼在做太子时，看到生、老、病、死都十分痛苦，就想找到一个使人脱离苦海、获得解脱的方法。经过多年的苦苦思索和实践，他最终创立了佛教。因此，佛教从一开始就关注人生问题，关注人心如何获得解脱问题。佛教中有两个著名的事例：“十四无记”和“箭喻”，能够说明佛教关注的重点。



《雪夜访普图》

明刘俊所画，绢本，淡设色，纵 143.2cm，横 75cm。描绘宋太祖赵匡胤雪夜访问谋士赵普的故事。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宋刻本《春秋经传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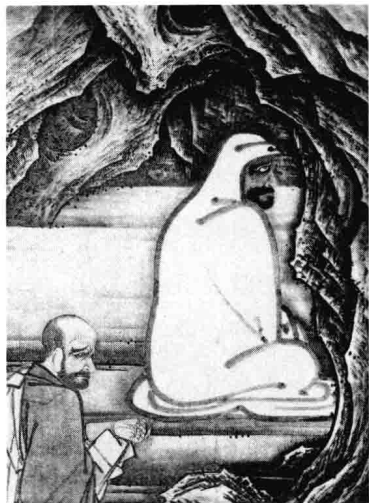
《春秋》是先秦儒家典籍，在汉代被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称为“《春秋》决狱”



印度比哈尔邦那烂陀寺遗址

那烂陀寺建于5世纪，意译施无厌寺，是古代中印度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北方的大寺院；玄奘印度取经处就是该地。当佛教在印度衰亡后，该寺成为一片废墟

据佛教《杂阿含经》记载，释迦牟尼住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时，有众多弟子讨论：世界是否恒常存在、世界有无边际、生命与身体是否合一、佛死后是否存在等。释迦牟尼得知弟子们讨论的问题后，问道：你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结果如何？弟子们说：我们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认为有，有人认为无，有人认为时有时无，共形成了十四个答案。释迦牟尼说：你们以后不要再讨论这些问题了。这些问题既不利于佛法，也不利于你们的修行。只有“四圣谛”才是真正的智慧，你们只有奉行“四圣谛”，才能最终获得解脱。释迦牟尼反对探讨的十四个问题，就是佛教中著名的“十四无记”。尽管释迦牟尼认为不应该讨论“十四无记”，但这些问题折磨着一位弟子，



慧可断臂图

纸本，水墨，淡彩，长196.8cm，宽99.9cm，  
日本室町时代禅僧雪舟（1420～1506年）绘。  
描绘慧可断臂求法，拜达摩为师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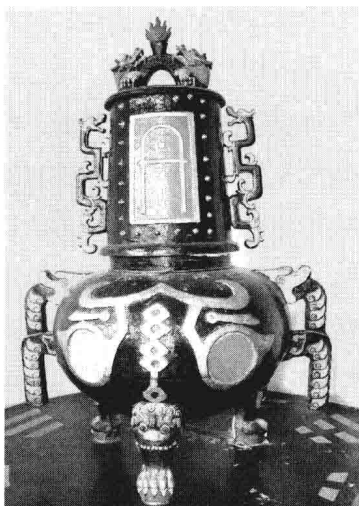
他觉得这些问题关系重大，非弄清不可，而释迦牟尼要求别人不要讨论这些问题，使他很不满意。于是他再次去请教这些问题，还说：如果释迦牟尼能给予令人满意的回答，他便继续跟随修道；如果释迦牟尼不给他明确答案，他便舍释迦牟尼而去。释迦牟尼听罢，没有立即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了一个譬喻：有个人身中毒箭，极感痛苦，他的亲人眷属深怀怜爱，赶紧为他寻找箭医，治疗箭伤。然而，这个中箭者却认为不能急着拔箭疗毒，应该首先弄清要请的医生的姓名什么？

身材如何？皮肤的颜色是什么？家庭出身是什么？籍贯在哪里？射我的弓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弓的颜色是什么？箭杆是什么材质？箭头的形状是什么？这个人坚持先弄清这些问题再拔箭医治，殊不知等不到他弄清后，早已毒发身亡。那些要弄清世界有常或无常等问题的人，就和那位中箭者一样愚痴。释迦牟尼接着解释：世间的众生都免不了生、老、病、死，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忧悲苦恼。从这些忧苦中解脱，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就像那身中毒箭者，赶紧找箭医拔箭疗毒，才是当务之急。至于世界永恒存在乃至佛死后是非有无等玄奥问题，不能使人获得智慧、觉悟和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不应该讨论。这就是佛教中的“箭喻”。佛教反对讨论“十四无记”，但对人的心灵和智慧却十分关心，认为解脱的根源在于心和智慧，因此佛教的解脱也

被称为“心解脱”或“慧解脱”。中国佛教中有一个故事：北齐天保初年（550年）有一位年逾40的居士到禅宗二祖慧可处，说道：弟子身患风疾，请和尚为我忏悔，使我不再受风疾折磨。慧可说：把你的罪过说给我听，我为你忏悔。来者沉思片刻说：我还说不出我的罪过究竟在什么地方？慧可说：我已为你忏悔过，你最好皈依佛法，出家为僧。居士说：今日见到和尚，已知自己是一个僧人了，但不知什么是佛法。慧可说：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你知道这个道理吗？居士领悟地说：“今日始知人的罪过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在于其心，佛法也是如此。”慧可闻言，十分器重这个人，而为他剃度，并且高兴地说：这是我朝的宝贝，赐给他法名僧璨。僧璨后来成为禅宗三祖。可见，佛教十分重视心灵和智慧问题，认为佛法在心中，而一向重视心的禅宗也被人称为“佛心宗”。正因为如此，宋孝宗认为佛教可以解决人的心灵问题，即“以佛教养心”。

再次，以道教养生。追求长生不老道教关注的重要内容。在道教发展史上，实现长生不老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早期的外丹法和后来的内丹法。外丹原称炼丹术。道教为避免其与内丹相混淆，改称外丹。这是以炼丹炉烧炼矿物类药物，制取“长生不死”仙丹的一种方术。丹砂（即朱砂，又称硫化汞  $\text{HgS}$ ）和汞（ $\text{Hg}$ ，即水银）是炼丹的重要原料。东汉末道士魏伯阳撰写的《周易参同契》是早期炼丹术的代表作。书中记载了利用黄金、水银、铅、硫磺、丹砂等炼丹的方法。东晋葛洪进一步发展了炼丹术。他总结了水法炼丹中金属间的置换现象，记载了从砷化合物中提炼单质砷的方法。当时的人们认为，服用这种用黄金、水银、铅、硫磺、砷等物质炼制的金丹，可以祛病延年，乃至长生不死。葛洪说：上等丹药可以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中等丹药可以养性，下等丹药可以除病。一时间，很多王公贵族争相服食丹药，





河南灵宝古函谷关仙阁内炼丹炉  
道教认为，服饰丹药，可以延年益寿，  
得道成仙。唐以前，以外丹为主；唐  
以后，以内丹为主

殊不知这些炼制的“金丹”燥热异常，毒性极大，对人体有害而无益。

东晋哀帝司马丕是最早因服丹药而死亡的皇帝。他即位之后，不管朝廷政务，无心春花秋月，不问冬去春来，一门心思按照道士传授的长生法，“不吃饭，只吃丹药”，以求长生不老。朝中大臣高崧劝谏说：这不是帝王应该干的事。如果这样，陛下实在就像出现日食月食一样犯了过失。司马丕不听劝谏，不久，他就中毒死在皇宫中，在位5年，死时25岁，成为因服丹药而死的皇帝中最短命一个。唐朝是外丹术发展的巅峰时期，因服食金丹而死亡的也最多。关于唐太宗李世民死因的说法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死于服食金丹。唐太宗晚年因身体不适，连续服食了一两年道教丹药仍不见效果后，就把目光转向了国外的丹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大将王玄策打败天竺帝那伏帝国，俘虏了方士那罗迺婆寐，将他献给唐太宗。这位从

西方来的“洋方士”自称已经活到 200 岁，会炼制长生不老金丹。唐太宗对“洋方士”的到来十分高兴，厚礼相待，请至皇宫内配制丹药，还命兵部尚书崔敦礼率领一批人马，协助炼丹。经过一年的炼制，丹药终于出炉，崔敦礼赶紧捧送入宫。正在病中的唐太宗见到期盼已久的仙丹，如获至宝，按照那罗迺娑婆寐的嘱咐，依法服食。然而，唐太宗万万没有想到，长生药竟成了催命药。他在吃下丹药后，身体顿觉不适，病情大为加剧，没过两个月就死去了，终年 52 岁。唐宪宗李纯，号称唐朝中兴之主，但后来也因服食丹药而导致精神错乱，终为臣子所杀。武宗李炎，因为服用丹药，年仅 33 岁就一命呜呼。宣宗李忱，他在治国方面有老祖宗李世民的遗风，时称“小太宗”，但也因服食丹药而亡，终年 50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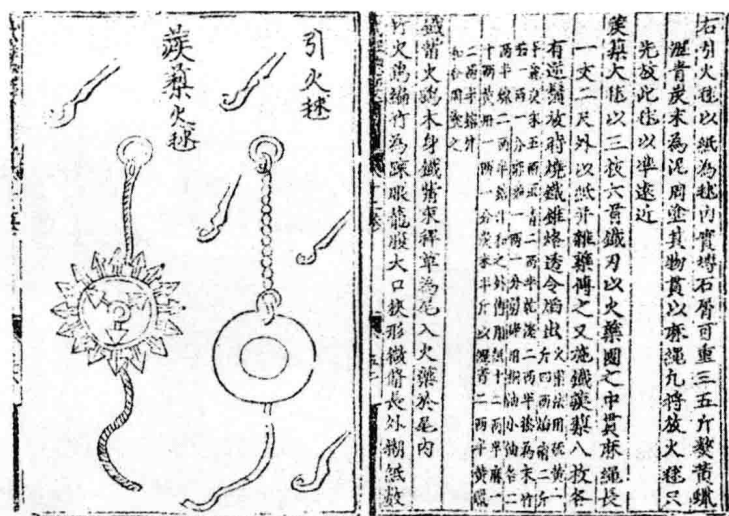


《炼丹图》

出自清代精绘本《本草品汇精要》（明刘文泰著），反映了当时炼丹的工艺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炼丹在医学上是误入歧途而完全失败，但长期的炼丹活动，却促进了古代化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少意外收获。驰名世界的火药，就是唐代炼丹家发明创造出来的。炼丹家通过硫磺、硝石与炭混合燃烧现象的观察与实验，制成了黑色火药。唐代《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关于“伏火矾法”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制造火药的实验记录。

由于服食外丹的危险性太大，屡屡有人丧命，所以唐以后道教外丹术逐渐泯灭不传，取而代之的是内丹术。内丹是指以人的身体为炼丹炉，以人的精、气、神为原料，在人的身体内部炼制长生不老丹药，



《武经总要》中关于火药配方的记载

火药是道士们专研炼丹术的副产品，在北宋时就已经应用在军事上。《武经总要》是宋仁宗命曾公亮、丁度编写，共四十卷，分前后两集：前集记录北宋军事制度，后集记录历代兵谋得失

也称还丹、金丹。内丹的盛行及其学说的发达，是晚唐以后的事。晚唐五代，大概由于盛行数百年之久的外丹术多次失败，加上佛学的刺激推动，内丹开始盛行，大有取代道教一切传统炼养方术之势。宋代的内丹术按主张与风格的差别，分为南、北、东、西、中五派。南派以白玉蟾、陈致虚为代表。北派是王嘉及其门下七大弟子之全真派。中派，指元初的李道纯之说。东派，指明代陆西星之说。西派，指清代四川嘉州李西月之说。



八仙雕像之钟离权

钟离权，又名汉钟离，五代时著名的道士，其内丹思想的直接承自《周易参同契》，是后世内丹思想发展之源

尽管内丹术的派别较多，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佛教，尤其是佛教禅宗的影响。内丹与禅，在修习的基本原则上，多有相通。五代时著名的内丹家钟离权就以佛家术语“真空”为修炼之要。至钟离权的门人吕洞宾，更以禅道融合作为其内丹说的基本特质。据传吕洞宾曾求学于禅宗黄龙晦机禅师，此后对禅宗深为服膺，倡导禅道双修。吕洞宾禅道双修的思想，成为后世内丹学发展的基本路线。北宋以后的内丹学诸家，几乎无不渊源于吕洞宾。北宋神宗朝的张伯端参究禅宗，撰《禅宗诗偈》作为修炼内丹的指导思想，被后世内丹家所推崇。

可以说，宋孝宗的“以儒家治世，以佛教养心，以道教养生”的思想，一方面概括了儒释道三教的不同理论特点：伦理、心性、长生；另一方面确定了儒释道三教在唐代以后的社会地位。因此，他的这三句话成为了佛教与儒道二教关系史上最为经典的论述。

## 明清皇帝的三教政策

明清两朝的诸位皇帝，大多重视佛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佛道二教与儒教一样，都有助于安定民心 and 国家的稳定。因此明清皇帝大多采用三教并用的政策。

### 明太祖的三教政策

在历代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的缘分最深厚，早年曾出家为僧。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流域灾害频发，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朱元璋的家庭也遭受了灭顶之灾，他的父亲、母亲、大哥、大哥的儿子在这场灾难中相继去世，家里只剩下他和二哥。为活命，二哥出外逃荒。朱元璋因为年纪小，到村子附近的寺庙出家做了和尚。因为寺中没有余粮，朱元璋只做了几十天的和尚，便被打发出门，云游四方。直到至正八年（1348年），朱元璋才又回到出家时的寺庙。云游的几年间，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靠化缘度日，和讨饭差不多。然而经过这几年云游的磨砺，朱元璋的视野大为开阔，人生阅历大为丰富，为后来的反元起义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十分重视发挥佛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表现：

首先，朱元璋提拔僧人担任各级官吏。朱元璋曾写过《拔儒僧入仕论》，作为其提拔僧人的重要理论基础。顾名思义，“拔儒僧入仕”征召的主要对象是精通儒学的僧人。朱元璋在文中奉劝僧人们说：释迦牟尼不是一般人，世人能像释迦牟尼的，实在没有几个。有大智慧的人，与其出家修炼，不如出仕辅佐君主，保天下太平，为国家社会做实质性的贡献。在朱元璋的劝导下，当时的一些著名僧人纷纷出仕

为官。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僧人慧昙了。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见到慧昙,赞叹曰:“此福德僧也。”于是授其二品官衔,赐“演梵善世利国从教大禅师”,统摄全国的佛教。又下令,如果有僧人行非法者,他全权严厉处置。慧昙领命,告示僧界:只要发生佛门的丑事,一定严惩不怠,毫不宽恕。第二年朝廷下诏慧昙主持大天界寺。慧昙尽心尽力报答朝廷,每逢法会必亲自主法,寺前车水马龙,人头如织,皇帝与百官前来临恩。明太祖亲自书写“天下第一禅林”的匾就悬在寺院的山门上。洪武三年慧昙奉诏出使西域,洪武四年九月慧昙圆寂僧伽罗国,逝世前为不能完成朝廷的使命而痛心。僧伽罗国王厚葬了他,将其灵骨安放国内的佛塔之侧。门友宗泐将慧昙的遗衣带回中国,藏于南京聚宝山雨花台。

其次,朱元璋十分注重维护佛教尊严。朱元璋十分忌讳别人提起他早年当过和尚这事,甚至每当他看到“光”、“秃”、“僧”这些字眼,都觉得刺眼。有不少儒士文人因此而掉了脑袋。明初地方官过年过节以及皇家喜庆日子都照例上表笺庆贺,说一些歌功颂德的话,就是这也惹出了不少的麻烦。如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的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等语,朱元璋牵强附会,说文中的“光”指光头,“生”是“僧”的谐音,他是在借进呈表文骂自己当过和尚。德安府训导吴宪的表文中有“望拜青门”之语,朱元璋认为“青门”是指和尚庙。这些犯了忌讳的,都被“诛其身而没其家”。

朱元璋不仅推崇佛教,对儒道二教也很重视。他曾亲自撰写《三教论》,推行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政策,认为儒教确立与传承的政治准则、伦理纲常是“万世根本”,而佛道二教处处教人明因果、辨善恶、示吉凶,劝人向善。朱元璋深知儒士有助于其创立政权,故在开创帝业的过程中大力吸纳各方儒士,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甚至对来自敌对营垒

中的儒士也能以礼相待。詹同，字同文，初名书，婺源人，本是朱元璋的敌人陈友谅的属下。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召詹同为国子监博士。詹同后来成为朱元璋的重要谋士。在明朝建立的过程中，类似詹同这样受朱元璋重要的儒生不胜枚举。

朱元璋与道教的渊源颇深。据说他家的祖坟是经过道士选择的风水地，有“天子气”。他母亲在妊娠时，梦见一位道士自西北来，取出一丸白色丹药说：“此美物可食。”朱元璋母亲吃后，顿觉满口香气。第二天，朱元璋出生，满屋红光，邻居以为着火了，纷纷前来救火，发现是朱元璋出生时的征兆，数日后依旧光芒四射，都感到很奇怪。在朱元璋幼年时的一天，有一个留着长须，身着红袍的道士到家中，见到其父亲就打了个稽首，说：“好个公公，八十三当大贵。”朱元璋的父亲见这道士不请自入，心中颇为不悦，等听到这番异言，想起当年有个红袍道士给妻子送药丸之事，顿时转怒为欢，忙请他坐下进茶。那道士竟不看而去，出了门即不见踪影。朱元璋建立明朝，当上皇帝后，追尊其父为淳皇帝，庙号仁祖。这年正好是其父 83 岁，与道士所说相符。

朱元璋在夺取政权时，有许多道士帮其出谋划策，周颠就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位。周颠，自称建昌（今江西永修）人，朱元璋占领南昌后回到金陵，周颠接踵而至，屡屡“告太平”。朱元璋不胜其烦，派人用酒将他灌醉，覆以巨缸，聚柴烧他，柴烧尽之后打开一看，他安然无恙，只是头顶上微微出汗而已。朱元璋大感惊异，命他寄食在蒋山寺，当地百姓争相供养。西征九江前，朱元璋特向他询问战事吉凶，担心不能战胜陈友谅，周颠答曰：“天上无他座”，表示朱元璋此次大战必胜无疑。朱元璋携之同行，途中因周颠预言并感叹死伤太甚，得罪朱元璋，把他投入江中，意在溺死。不料当大军停驻湖口时，



### 庐山御碑亭

明太祖朱元璋为宣扬自己顺应天时统一中国的功绩，借纪念恩人周颠和尚为名，在这里建一石亭，名为“御碑亭”



周颠又来乞食，朱元璋无奈，只好听之任之，后不知去向。

洪武十六年（1383年），有一位赤脚僧名觉显，受周颠之托，从庐山突然到金陵拜见朱元璋。4年后，当觉显要返回庐山时，朱元璋特意作诗两首，请其转交周颠仙人。又过了几年，朱元璋患了热症，几乎要病死，这时赤脚僧又受周颠之遣，赴金陵送药，并献来了周颠道人的诗二首。朱元璋服药后，精神日强一日，竟然痊愈。朱元璋亲作《周颠仙人传》，纪念这位道士。

### 明成祖的佛教政策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将帝位传给了皇太子朱允炆，年号建文，俗称建文帝。建文帝的叔叔燕王朱棣随后以“清君侧”为由起兵，史称“靖难之役”。历经4年，占领南京，朱棣从



明成祖朱棣

朱棣（1360～1424年），年号永乐，朱元璋第四子。明洪武三年（1370年）封燕王；建文元年（1399年）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死后葬北京昌平天寿山明长陵。

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得皇帝宝座，改年号永乐，即明成祖。明成祖在位 22 年，推行较为实用的三教政策，其中对佛教关注颇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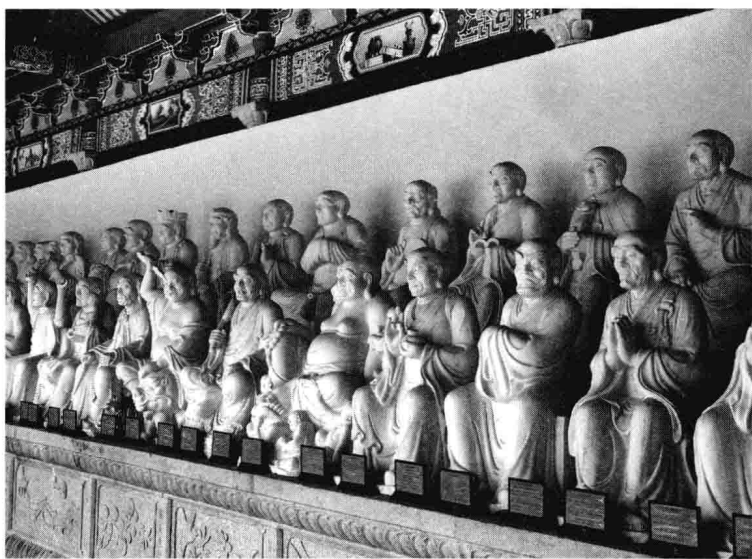
明成祖之所以关注佛教，重要原因在于他在起兵过程中得到道衍禅师的大力支持，使其对佛教产生深厚的感情。道衍俗名姚广孝，元顺帝正元元年（1341 年）生于长洲相城（今苏州境内）。14 岁时在家乡妙智庵出家，法名道衍，18 岁剃度受戒，正式为僧。这位出身一般的僧人，在日后因协助燕王朱棣“靖难”成功夺得皇位，被尊为“论功为第一”的功臣。道衍出家后，读书十分刻苦，尤善诗文，得到当时文学名士的赏识和称赞。在洪武年间，道衍也位列朱元璋征召的入仕僧人之中，但他坚决不接受官位，还将朱元璋赐给的官服退还。道



#### 道衍禅师

道衍（1335～1418 年），俗名姚广孝，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辅佐燕王发动靖难之变，成为明成祖即位之主要功臣

衍此举在佛教界获得了更大的名声。宋濂赞扬他是“达摩正传”、佛教界“第一人”。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选高僧为诸位王子诵经祈福，道衍被推荐给燕王朱棣，从此住在北京的庆寿寺，成为朱棣的幕僚，正式开始了参与政治的道路。关于朱棣与道衍的第一次相见，明代书中曾有记录，说是燕王见道衍其貌不扬，便不喜欢他。道衍把燕王叫到一旁，耳语一句：殿下若是带我前往北京，我将送一顶大白帽子给您戴。这是一句隐语，王字头上加一个白字，即是“皇”字。朱棣听了这句话，当即同意带道衍回北京。据说，朱棣起初对举兵之事犹豫不决，为了使其增强信心，道衍请来20多年前在嵩山认识的



**五百罗汉像**

这是福建省福鼎市太姥山香山寺五百罗汉堂。五百罗汉为五百阿罗汉的略称，意为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位的500位声闻

老友袁珙，请他为朱棣看相。朱棣混迹一大群士兵之中，袁珙一眼将他认出，并说他有帝王之相，44岁时将登大位。4年的“靖难之役”中，道衍因年事已高，不能随朱棣征战，他留在北京，辅佐世子朱高炽镇守后方，筹集粮草。但是，朱棣每有疑难，还是书信相问。靖难之役中，几乎任何一场重大的战役，都有道衍的谋划，他实际担任了靖难之师的总参谋长。其重要性可以比拟刘邦身边的张良以及朱元璋身边的刘伯温。朱棣登基后，道衍便日渐淡出朝政。朱棣给他派了一个美差，让他到松江、嘉兴、苏州、湖州等地赈灾。临行前，朱棣对他说：人君一衣一饭都取自百姓，怎么可以不体恤救济。君是父亲，民是儿子。作为儿子应当孝顺，作为父亲应该慈爱。各尽其道。你此次前往，应体谅朕的苦心，不要为国家怜惜钱财。拿着国家的钱到家乡赈灾，可以视为朱棣对道衍尽心辅佐的回报。

### 嘉靖帝的道教政策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年)，是明代第十一位皇帝，也是明代前中期在位时间(1521～1566年)第二长的皇帝，因为年号嘉靖，而被称为嘉靖皇帝。嘉靖是正德皇帝的堂弟，本来与皇位无缘。但由于正德帝荒淫无度，31岁即早逝，且无子嗣，于是在湖广安陆府、年仅15岁的朱厚熜赴京继位，次年改年号为嘉靖。嘉靖尊崇道教，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道教发展的政策。

嘉靖帝的父亲朱佑杭是一位非常虔诚的道教信徒，他的封地湖北钟祥县，与江西龙虎山相距不远，那里正是道教发祥地之一。据说朱佑杭与龙虎山的道士们过往甚密，在他的王府中时常会举行一些与道教有关的活动，甚至将书堂设为奉道之所。其中，朱佑杭与玄妙观纯一道人的交往最值得注意。嘉靖出生的当日中午，朱佑杭在午睡时梦



《张天师神马驱邪》

清末年画。张道陵（34～156年），字辅汉，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被尊称为“张天师”，他的后世子孙世袭天师名号

到纯一道人入宫，恰在此时，宫人来报嘉靖降生。朱佑杭认定嘉靖的出生与纯一道人有必然的联系。受父亲的影响，嘉靖自幼受到道教的影响。当上皇帝后，他不仅本人信奉道教，而且利用国家政权大力推崇道教。

首先，优待道士。嘉靖登基之始，江西龙虎山上的正一道第四十八代天师张彦颢入朝贺礼，并告诉嘉靖要清心寡欲方可延年益寿。次年，嘉靖要张彦颢娶安远侯柳文之女为继室，下令在京各级官吏都必须参加婚礼，并封张彦颢为“正一嗣教怀玄抱真养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虚冲静承先弘化大真人”。陶仲文是嘉靖朝另一位受宠的道士。陶仲文，湖广黄冈人，曾做过黄梅县的县史，喜好神仙方术，与龙虎山道士邵元节交往密切。他来京城，就住在邵元节的邸舍中。宫中有一些事情因邵元节年老不能去的，就让陶仲文代替去办，从此受到嘉靖帝宠信达20年之久。嘉靖十八年（1539年）陶仲文被封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食正二品俸禄，父母及妻子都被加封。十九年（1540年），嘉靖生病，由陶仲文为之祈祷，病愈后授其少保、礼部尚书，食正一品俸禄。二十一年（1542年），嘉靖信陶仲文之言，移居深宫，终日作法求长生，不再相接群臣，唯独陶仲文可以随时得见，且嘉靖称其为师父。

其次，积极从事道教法术。作为一国之君的嘉靖帝，十分信奉道教法术，他在位时，积极从事各种道教法术活动，以至于闹出宫廷内乱。嘉靖朝宫女倍受虐待，稍不如意，则加重刑，常有无故杖死者，加之



**安徽休宁县齐云山月华天街**

嘉靖皇帝敕建的玄天太素宫为主体的齐云山月华街一带，是道士和一般村民同住的地方，因此月华街被称为中国道教第一村



《晴峦萧寺图》

宋代李成作。美国堪萨斯城威尔逊美术馆藏

嘉靖崇奉道教法术，经常命道士取宫女们的经血炼制长生不老仙丹。宫女们不堪压迫，想将嘉靖帝勒死。于是在杨金英的率领下，16名宫女闯入嘉靖帝的寝宫，趁其熟睡之机，将他困住，用绳子勒其颈部，但慌乱之中错把绳子打成死结，使嘉靖一息尚存。这时有宫女叛变告密，宫中侍卫前来营救，嘉靖帝得以脱险。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壬寅宫变”。参与宫变的人全部凌迟处死，嘉靖大难不死，被认为是得到了玉帝天尊的护佑，从此对道教方术更加信赖。

再次，动用国家财力，大肆营造道教宫观。嘉靖帝为了供奉道教神仙，大兴土木，建宫设坛，耗费了大量国家财力。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仅四川、贵州、湖广等省供应修建宫观木材的费用就达339万两白银。每年举行道教法术仪式，都需要将数千两黄金做成金泥，用于书写门匾对联。另外，祭祀神仙每每使用大量珠宝玉器、沉香等，所需费用无法计数。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命景德镇烧制道教所需瓷器就达3万件，至今留存的嘉靖朝宫廷瓷器上都有道教内容。由于嘉靖崇道耗费巨大，当时的户部主事海瑞上书劝谏，导致嘉靖帝大怒，海瑞被逮捕入狱，准备处以死罪。后因嘉靖帝驾崩才获释。

### 雍正帝的三教政策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年），清圣祖玄烨第四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年号雍正，故常被称为雍正帝。雍正帝作为清朝承上启下的皇帝，在位13年，努力改革康熙晚年的弊政，为后来乾隆朝的兴盛奠定的基础。在清朝的13位皇帝中，雍正与佛道二教的交往最为突出。他亲自修行佛教禅定之法，成为中国历代帝王中唯一一位被佛教界认可的大禅师；晚年却因食用道教丹药而毒发生亡。



在儒释道三教政策上，雍正帝延续明清两朝多数皇帝的做法——推崇三教、辅佐政事。

首先，雍正与佛教。雍正帝与佛教，尤其是与禅宗的因缘很深。在他亲自撰写的《御选语录》前后序言中作了详细的自述。雍正年轻时就喜读佛经，曾经广交僧人，与章嘉国师交往 10 余年。章嘉国师是康熙敕封的“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康熙五十年（1711 年），33 岁的雍正连续坐禅两日，自我感觉有所悟，但章嘉国师认为雍正如同井中窥天，才刚刚领域到禅的意蕴，勉励他继续努力。

此后，雍正在结云堂闭关坐禅，一天夜晚忽然出了一身汗，心中有桶底脱落一般的感觉。章嘉国师再次指出，这仍不过是井中窥天，还要继续努力。直到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禅定中的雍正忽然感到万物“本空”之道。此时章嘉国师才认为雍正体悟到佛法的真谛。由于得到章嘉国师的认可，雍正历来被佛教界公认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参透三关的皇帝。正是有上述佛教因缘，因此他在当时激烈的皇储之争中，能够潜心修持，韬光养晦，以定应乱，反而脱颖而出，得到康熙的称许。

雍正帝在佛学方面大量地著书立说，以影响佛教领域。他写有《教乘法数》、《园明语录》、《集云百问》、《拣魔辨异录》、《悦心集》、《破尘居士语录》、《御选语录》等佛学著作，编有《翻译名义选》、《禅



青花八仙葫芦瓶

明世宗信奉道教，故明嘉靖年间（1522～1566 年）的瓷器上多有道教题材绘画



山西五台山台怀镇海寺章嘉国师塔

章嘉国师若贝多吉(1717~1786年),在雍正二年(1724年)入京,驻京62年,受到雍、乾两朝皇帝的特殊恩宠。为蒙藏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团结与安定,做出很大贡献

师心赋选注》、《大觉禅师录》、《万善同归集》、《当今法会》、《经海一滴》、《宗镜大纲》等佛学作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雍正十一年刊行的禅宗语录集——《雍正御选语录》。雍正该书的原则是：不重虚名浪誉，不尚美言佳句，只看是否符合佛教义理。他亲自选编出了历史上12位主要禅师的重要语录及其它500多位禅僧、居士的禅语，同时还收录了雍正自己写的禅语。特别是在每卷语录之前，雍正御制序言，谆谆提示，阐明心要，指示学人，实在是十分难得的点睛之笔。该书完全打破了佛法与儒道、禅宗与净土宗的门派之见。因此这部《雍正御选语录》处处显示了雍正皇帝对佛教的理解，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般重要著作。

雍正帝十分注重保护和维修寺庙。当时的直隶唐山县令反对佛教，下令驱赶僧人，强夺僧舍，改为民房。雍正帝闻讯后，下旨立即将该县令拘拿问罪，后因侍郎出面说情，便对县令从轻发落。江南荆溪（今宜兴县）崇恩寺，曾是玉林禅师传法之所，雍正下令扩建。浙江绍兴报恩寺当初也是玉林禅师的开堂场所，雍正专门下旨维修。浙江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雍正动用官府资金，派遣专官监督修饰这里的普济寺、法雨寺。

其次，雍正与道教。虽然雍正帝信奉佛教，但他对道教的感情也十分深厚。在争夺皇位的关键时刻，雍正对武夷山道士给他算的命，深信不疑。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雍正的手下亲信戴铎前往福建任知府，在给雍正的一封信中说：武夷山有一道士行踪不定，言语甚奇。雍正见信后非常重视，立即批复道：“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戴铎回复：我请他为您算命，他只说了一个字“万”。道士所算“万”字命，令雍正兴奋不已。雍正继位后，因身体不适，要求心腹大臣给他推荐良医。李卫访得河南省道士贾士芳，将其送至京城。贾士芳为



北京雍和宫大殿的匾额

雍和宫旧址原为明代内官监官房，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成为皇四子胤禛的府邸，距今已有300年历史。雍正驾崩后，乾隆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喇嘛寺，现为北京市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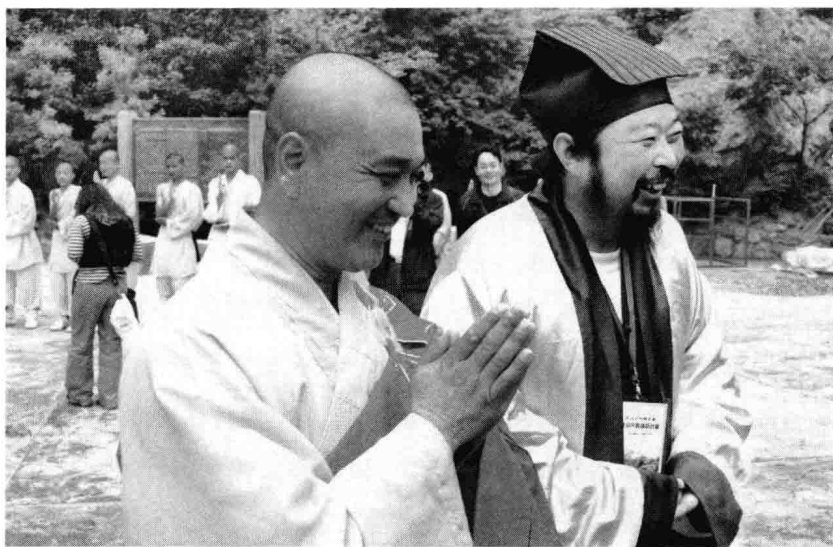


#### 着道士装的雍正帝

雍正帝尊崇道教，常参加道教活动，还经常服用道人所炼丹药

雍正作法，开始效果良好，雍正很高兴。不久，又认为贾氏用妖术掌握了他的健康，下令将其处死。之后，雍正疾病未愈，认为是贾士芳的邪气缠绕，又找了一个道士娄近垣。娄近垣设坛祈祷除祟，不久果然痊愈，娄近垣因此备受宠信，被授四品官衔，不久又被封为妙正真人。

事实上，雍正信奉佛道二教并非只是出于个人的原因，他是将佛道与儒教一起，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他对于儒释道三教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曾有一段感言：“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明心见性，道教之练气凝神，亦与吾儒存心养气旨之不悖。且其教皆主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儒教的作用是按照圣人的教化来治理国家，是国家基本法度，佛教强调明心见性，道教提倡练气凝神，他们与儒教的说法并不相悖。三者的目的都是劝人向善，都有助于治理国家。



### 和尚与道士

随着佛道交流深入，二者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助的局面

可以说，雍正的这段话概括了明清两朝皇帝对儒释道三教的看法，并且他们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也是这样执行三教并用的政策。

纵观东汉以来 2000 余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佛教与儒道二教之间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东汉年间是佛教借助儒道二教在中国站稳脚步的时期。此时刚刚进入中国的佛教带有浓厚的异域文化色彩，尚难以为中国人所接受，因此佛教采用了依附于儒教和道教的方式，通过吸收儒教的伦理思想和道教的神仙方术，从而逐渐站稳脚步，被中国文化接受。第二，魏晋至唐时期，佛教与儒道二教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魏晋以后，佛教在中国的影响逐渐增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开始与儒道二教产生冲突，由此产生了在不同政治势力支持下的佛教与儒道之间的政治冲突，“三武一宗灭佛”是其中的典型事件。然而，在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中，它们之间的思想融合也在加速进行，儒、佛、道三教中都出现了明显的相互吸收利用对方思想资源的痕迹。第三，宋以后，虽然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势力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但它对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渗透进一步加强。在政治上，佛教成为辅助儒家发挥教化的因素，宋朝以后的统治者大多利用佛教来为封建王朝服务；在社会文化领域，佛教不但对宋明理学和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最终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诞生于印度的佛教最终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佛教也得益于这种良性发展的三教关系。我们知道，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但 11 世纪以后，佛教逐渐淡出了印度历史，却在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时至今日，中国佛教依旧在有着重大的影响。